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⑭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 ⑮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⑯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典范 王玉君 04

【峥嵘岁月】

忆鲁东南特委 景晓村 06

天桥固反顽战斗 石绍庆 09

纪念我的父亲 李新民 12

我们六八六团的九二步兵炮 王 桓 15

铁军大帐追歌行（十）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8

【名人素描】

模范政委吴岱（中） 佚 名 22

司马睿：建立东晋的短命皇帝 劳富平 27

【探索发现】

东晋皇帝司马睿身世之迹 台湾知府 31

一个人俘虏伪军一个连

——记一等战斗英雄安保全 高 雷 33

【文化掇英】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十）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38

【文史论坛】

季氏与费县（下） 丁兆铭 41

【蒙山沂水】

- 帝乡雷泽：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郎兴启 48
捕野兔 王宗富 53

【古城旧事】

- 记忆中的老建筑——琅邪王冢公园 本 编 55

【史料辑存】

- 唐宋第一将门琅邪符令奇家族浅析 符东淮 56

【诗画欣赏】

- 宋拓颜真卿《奉命帖》 沉入史海 60

【影像沂蒙】

- 临沂汽车站的变迁 本 编 62

【百家渊流】

- 姓氏百家漫谈——孙姓（二） 赵丹峰 64

【文明之星】

- 马建波：字典里没有“不”的好人 王泓钧 70

【沂蒙名医】

- 杏林之外科俊杰
——记李明君 刘凤才 73

【史志动态】

80

封面：琅邪王冢公园

（详见本期《琅邪王冢公园》）

封底：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胜也。

选自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军形篇》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6000册

发送对象：临沂市史志系统内部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典范

王玉君

编者按：11月24日《学习时报》领导论苑，全文刊发了临沂市委书记王玉君同志撰写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典范》，现全文转载如下。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忘初心，不懈奋斗。当前尤其需要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以“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的行动，增强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自觉，再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党群关系，凝聚推动历史进步的磅礴力量，奋力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临沂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全面回顾山东根据地革命史，深入探究党群关系为什么能达到“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境界，我们理解，沂蒙精神内涵是：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为人民靠人民”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它赋予沂蒙精神崇高的真理力量，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逻辑起点。

“为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山东根据地，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与把握历史前进规律的内在统一，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作风等各方面发展和保障群众利益，“为人民”成为前所未有的政治实践和社会运动。一切为了人民是那么纯粹。有了这样的政治立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水到渠成。

“靠人民”是共产党人的最大政治智慧。尽管当时的沂蒙山区那么苦、那么穷、斗争那么残酷，但只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党就能立足扎根、发展壮大。在山东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吃的是乡亲们筹的粮，住的是老百姓让的房，穿的是红嫂们缝的衣，受伤躺的是老乡抬的担架，遇到危险靠的是群众的掩护，急行军实在没办法过的是“识字班”肩扛的“火线桥”。罗荣桓元帅曾经感慨：“有了群众，就有了粮食，有了战场，有了兵员，就一定能够由弱变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一切依靠群众是那么有力。有了这样的政治选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牢不可破。

“忠诚看齐革命到底”浓缩的是共产党、八路军一切行动背后的根本精神和品格，它赋予沂蒙精神强大的实践力量，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行动引领。

“忠诚看齐”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规矩，也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在山东根据地，正是凭着“忠诚看齐”这一政治灵魂，山东根据地构建起中央和地方、党的领袖和党政军民之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关系。这无疑是沂蒙精神最突出的个性、最宝贵的财富。有了这样的政治境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最根本的保证。

“革命到底”是共产党人实现远大理想必备的意志品格。在山东根据地，无数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用革命到底的意志践行忠诚、献身理想，推动根据地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一部沂蒙革命史，就是一部坚定信仰不动摇的历史，为了胜利不怕死的历史，执着革命不觉苦的历史，勇于担当不退缩的历史。有了这样的政治气概，“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持久永续。

“听党话跟党走”是沂蒙群众对“人民离不开党”这个历史命题的最好回答，它赋予沂蒙精神鲜明的人民性，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信任基石。

“听党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沂蒙百姓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听党的话？因为党用生动语言所讲的，正是沂蒙百姓已经产生的强烈愿望、朦胧感觉的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是沂蒙人民经过战争洗礼和历史积淀后的政治信念，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信任回应，“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

“跟党走”。以党的方向为方向、紧紧追随着党，是沂蒙百姓对党无比信任、对人民军队一往情深的自觉行动。一句“只要跟党走、就能得胜利”，充分体现了历史进步中政党主导作用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沂蒙百姓用实际行动回应着这样的认知：跟党走就要全力支持党的工作，就要踊跃参加党的队伍，就要争取加入党的组织。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道路选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

“敢于斗争无私奉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思想理论引导下，在共产党人风范感召下，在苦难辉煌历史中的升华，它赋予沂蒙精神丰富的人文色彩，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不竭的力量源泉。

“敢于斗争”源于沂蒙文化的底蕴。在山东根据地，沂蒙人民的敢于斗争，是在压迫面前的不屈，是在苦难面前的坚韧，是在困境面前的智慧，是在历史转折中的清醒。可以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苦难多么深重、情况多么危急，沂蒙人民总是有骨气、有锐气、有勇气挺身而出。有了这样的底色，“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可靠的社会精神基础。

“无私奉献”是沂蒙人民最淳朴、最生动、最壮美、最感人的大爱所在。感人意味崇高，群体代表精神。一个个红嫂、一副副担架、一摞摞煎饼、一件件军衣、一双双布鞋，代表着当年的牺牲奉献，涤荡着人们的心灵。在山东根据地，无私奉献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境界，创造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新实践，提升了革命文化的新高度。有了这样的大爱壮举，“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有了丰厚的社会道德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感到，沂蒙精神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当年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价值观、方法论、政治立场、意志品格、作风纪律、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实践，昭示着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和广大群众应当坚守的奋斗初心和行动原点。要发扬“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的精神，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忆鲁东南特委

景晓村



中共鲁东南特委是在1938年8月根据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建立的。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败走，整个山东很快沦为敌后。坚持敌后抗战的重任落在山东党组织的肩上。

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1938年1月1日举行了徂徕山起义。鲁南、鲁中、鲁西、渤海、胶东等地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纷纷举起武装抗日义旗，很快组织起一二万人的抗日武装。有了人民的抗日武装，怎样坚持敌后抗战呢？早在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不久，中共中央在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中指出：山东党“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关于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方向，中央指出：“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为贯彻中央这一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以创建蒙山中枢根据地为中心的《发展和

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并得到中央的批准。7月，边区省委即决定建立中共鲁东南特委。山东抗战的历史已经证明，省委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我是和刘涌同志一起去鲁东南的。在此之前，我在省委任青年部长。我们先到了莒县的岳家沟，因为刚从沂水开来并改编不久的二支队驻在这里。在岳家沟，我们向二支队的司令员罗积伟、政委杨昆、副司令员吴坤等同志传达了边区省委关于建立鲁东南特委的指示，了解了鲁东南地区一些情况。不几天，崔介同志也赶到岳家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共鲁东南特委就在莒南大店正式成立了，时间是1938年8月。特委的成员有我和刘涌、刘居英、李仲林、崔介、杨昆、张岗等。开始，特委的分工是，我任书记，杨昆任组织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刘涌任军事部长，刘居英、张岗同志主要在国民党新六师工作，不常在特委。大约在年底，由于人员变动，特委机关在莒县桑园得到进一步健全，李仲林接任组织部长，新添了李均任宣传部长，谢辉任军事部副部长，张敬堂做职工工作，李纪德负责做青年工作，袁子扬任秘书处主任。当时特委所辖的鲁东南地区，包括诸城、莒县、日照、赣榆等县全部和高密、胶县的一部分。

与特委在大店正式成立的同时，二支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二支队，刘涌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杨昆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供给处、军医处等。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二支队下辖两个营，罗积伟、吴坤分任一、二营营长。二支队是特委领导下鲁东南地区的第一支正规部队，为开辟和建立鲁东南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特委建立后，我们首先分析了鲁东南地区敌、友、顽、我各方面的情况。1938年8月的鲁东南地区，除胶县、高密等少数几个县城和集镇为敌人占领外，大部分地区尚无敌人。县、区、乡地方政权还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的军队主要是高树勋的新编第六师，驻在莒县，其他则是各县新建的游击队、保安旅、保安团等等。他们划地为营，各自为政，十分混乱。当时我们党的组织在鲁东南地区还是很薄弱、很分散的，而且很不统一。莒县是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由郭有邻同志发展了一批党员，刚刚由特支改建为县委，其它各县都没有县级组织。日照有范景遵联系的少数党员，还有东北军一一二师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个别支部；赣榆县有几个党员，也是由东北军地下党领导的；莒北有点零星关系，莒南十字路一带的张子亮正在扩充军队，是由四支队直接联系的。另外，在莒县国民党许树声部队里，也有我们一些党员。但是，这些组织是多头领导，互不联系，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缺乏统一领导。党在整个鲁东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和影响还不大。

鉴于上述情况，特委建立以后，首先是统一鲁东南地区党的领导，并着重抓了这么几件工作：一个是宣传，一个是统战，一个是抗日武装。所谓宣传，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特委和二支队，不论是机关，还是部队，走到哪里都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在大店住了二三个月，又到莒北桑园，开辟莒日边区的工作。我们召开过一些会议，举办过干部训练班，组织过民运工作队，专门做群众工作等等。不久就统一了鲁东南地区党的领导。到1938年底，莒县、日照、诸城都已建立了县委，到1939年3月，胶县、赣榆等建立了工委。1939年春，我们又决定建立莒赣临边区工委，以便依托莒县向南发展。统战工作，一方面是和国民党新编第六师高树勋部的统战，高部入莒以后，和我们党的关系还不错，后来出了些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和地方势力派搞好统战，像赣榆的县长朱爱周，莒县的县长许树声等等，这些人手下都有我们的地下党员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当时，在地方上国共合作的一个形式就是动委会，叫民众

抗日动员委员会。拿莒县来说，从县到区、乡的动委会，大都由我们来掌握，区、乡动委会的指导员不少是由我们党的干部来担任。再一个方面，就是做好地方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莒县的一些士绅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之，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春，鲁东南地区特别是莒县、赣榆的统战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武装建设，这是我们的一项根本建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在当时来说，你手里没有军队，谁听你的！四支队六大队从沂水开到莒县时，只是四五百人，到了8月就发展到700余人，不久，又收编了朱信斋部300余人，编了一个独立营。后来，又成立了莒县独立营。到11月或年底这个时候，二支队已拥有一千三四百人马。这就是一支像样的队伍了。记得诸城县有一股地主武装，势力比较大，在当地胡作非为，残害百姓。诸城县独立营的一个连，遭他们突然袭击，全连被消灭。二支队到达诸城后，摧毁了这股反动武装的两个据点，铲除了石头河的敌伪组织，接着进驻了胶县重镇泊里，曾用土炮轰跑了日本鬼子的汽艇。这些军事斗争的胜利，轰动了诸胶边区，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1939年春节之后，大约是3月份，省委调动了我的工作，叫我到清河特委书记，高克亭同志接任鲁东南特委书记。我在鲁东南特委虽然只工作了七八个月，但作为创建滨海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开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左二）、副书记王卓如、组织部长苏杰

天桥崮反顽战斗

石绍庆

1940年冬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鲁中地区，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吴化文等和地方土顽互相勾结，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分割。1941年8月下旬，沈鸿烈调离山东，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名义上实现了对山东党政军权的统一领导。这一时期，牟中珩在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点同沈鸿烈无大区别。9月下旬，牟中珩指挥一一四师各部屡屡进犯沂蒙抗日根据地。

1941年10月14日，于学忠致电何应钦，汇报制裁奸伪战况：“牟总指挥虞电，据张师长冬电：（A）艳未我（684R）团长率第六区及平射炮一班艳寅进剿上姜坡、沂西南，二营拂晓由黄囤、虎屯、凤凰山等处向黑碗进攻，拂晓进瓦屋寨，包围下李庄朱位东奸伪，伤亡甚重，上午十时突围溃窜。我三营沿瓦屋寨东进，同时，六连经杜泉、官庄向南大坪进攻，午后一时许，六连与三营会合向奸伪老巢大坪、朱家坪一带攻袭，同时电飭（680R）李团率部进驻门庄、盘龙岗一代蒙东北协助（684R）作战。

（B）艳未我（684R）六连进占朱家坪东南山顶，因天晚撤回南大坪，卅寅在大顶集结百余以手榴弹向我猛攻，战二小时，因恐奸伪增员，撤退南大坪晏婴崮。是役，伤毙奸伪四五十，俘获步枪89支。”

于学忠电报中“制裁奸伪”行动即为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于9月下旬进犯打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军事行动。“牟总指挥”即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张师长”即新任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师长张福祿；684R、680R为一一四师六八四团、六八〇团。电报中提及的“瓦屋寨、



朱家坪、门庄、盘龙岗、晏婴崮、朱位、下李庄（即下里庄）”等地名当时均属于八路军山东纵队各部驻防地。

针对五十一军破坏抗战统一战线的行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于10月3日致电于学忠历陈事实：“上月二十七日，五一军六八〇团配合刘桂棠、刘瘦岑、武彧生各一部，分三路向沂水以西我一旅驻地进攻，一路由朱位（沂水西）向以南之下里庄进攻，一路约两营兵力，由下位（朱位东）向以南瓦屋山进攻。一路约一营兵力，由荆山头向以南崔家峪孙家官庄进攻。本月冬日（二日）各该路复继续向我攻击，一路进攻凤凰顶（朱位西），一路由孙家官庄进攻大顶予山，一路（一日）由瓦屋寨进攻榆村顶，我晏婴崮一个连现仍被包围中。”并表示，“窃查职各部矢志抗战，坚守国土，虽无奇功，自信亦无大过，刘桂棠等汉奸败类，嫉我忌我，破坏我，固无足奇，五一军乃抗战国军，亦竟如是，诚难获解，深恐对立成仇，众愤难仰，恳请总座对职等陷（三十日）电所陈各节，能早有明示。并对六八〇团在沂水所策动之磨擦，即予有效制止，则一切从长计议，临电惶恐，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徐向前与朱瑞的电报中提到的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土匪出身，曾于1939年投奔八路军，复于1940年3月降日。刘瘦岑，张里元在沂水主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务时曾出任教育科科长，后出任国民党沂水县县长。武彧生，沂水县高庄镇朱位村人，组织反动地主武装“沂蒙大队”，并自任队长，曾将中共沂水县四区区委书记李松残忍杀害，新中国成立后逃亡台湾。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八路军山东纵队始终遵守着毛泽东所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政治上与于学忠交涉的同时，10月8日，山东纵队一旅、四旅一部及纵队青年团发起北沂蒙反顽战役。

此时，驻扎在天桥崮的是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六八三团一个连160多人，并以此侵扰我军沂北各根据地。天桥崮在沂水县城西北33公里处，呈南北走向，海拔596米，面积0.6平方公里。天桥崮顶残存着清朝咸同年间防御土匪的圩寨，寨墙分内外二层。外侧在海拔575米左右的悬崖上建筑有围墙，围墙高达五六米，南面悬崖处高达七八米，可谓易守难攻。收复天桥崮的战斗，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阶段反顽作战的序幕，对双方都利害攸关。只要收复了天桥崮，第二阶段的反顽作战就会势如破竹，胜利地发展下去。担任强攻天险首战任务的是八路军山纵一旅二团。

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师长张福祿，东北陆军讲武堂军事研究班毕业。在1939年夏日军的大扫荡中，一一四师师长方叔洪殉职，时任副师长的张福祿接任师长职位。该部参谋长为中共党员解方。八路军山纵一旅旅长为王建安，政委为周赤萍，二团团长为吴瑞林。

天桥崮上顽军配备机枪7挺和步枪130余支，从群众中抢来的粮食足够吃一个月；崮东边作为防守正面，修筑有16个地堡；崮西边因为山势较高，也筑有4个地堡，堡与堡之间由于岩石坚硬都没有打通，只能单独固守，缺乏联络。为了防止我军进攻，在斜坡小道30米处炸开了约宽10米左右的一个大缺口，顽军上下采用绳子软梯通过。

针对这种情况，为一举拿下天桥崮，吴瑞林确定了由三营担任主攻，一、二营打援。三营组成30多个突击组、梯子组、火力组和爆破组，磨拳擦掌，表示一定要攻下天桥崮。接着吴瑞林又带团营连干部和三营各种战斗组组长再次到现场研究打法。战前确定的强攻部署是：以三营的七、八、九连组成3个突击队，每队10个突击组，共配备团直属的4挺重机枪和4个掷弹筒，又从一、二连抽调8挺轻机枪，这些武器均各半分置于天桥崮的东西两面，且要求两面各以2挺轻机枪备用，由八、九连组成的突击队作为第一梯队担任主攻，七连组成的突击队为第二梯队；团属工兵排分为4个

爆破组，东西各2组，准备与突击队协同动作摧毁敌堡；梯子组准备10架独木梯，每梯附木杆1根，东西两面各使用3架梯子，2架备用；一、二连在准备打援的同时，围歼天桥崮附近的4个小崮上的小股顽军；后勤同志要备齐造梯子、绑火球用的一切器材，以及运伤员的担架。团长吴瑞林和三营副营长柴玉兴带领九连突击队强攻崮西，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和三营营长刘培农同志带领八连突击队强攻崮东。

10月中旬的某夜8时，总攻开始。东西两面立即发出两发白色信号弹，10多个火球同时射上山头，都射在地堡周围，崮上杂草顷刻间熊熊燃烧起来，将地堡照得如同白天一般。独木梯组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搭好梯子，突击队、爆破组如离弦之箭，迅猛出击，仅用了3分钟时间就登上山头。在我军轻重机枪火力网的掩护下，爆破组连续炸毁10多个地堡，毙伤顽军30多人，突击队乘胜攻至崮顶展开围歼战。只听得枪声、爆炸声、“缴枪不杀”的怒吼声交织成一片。战斗历时25分钟，共毙伤顽军30多人，俘虏顽军连长以下1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另炸毁2挺）、步枪130多支、子弹2万多发和电台1部，守顽全部被歼。被我军一、二营各围住两个小崮各一个排的顽军，也举手缴械投降。全部战斗我方仅伤19人，牺牲7人，胜利完成了强攻天险收复天桥崮的战斗任务。

战后，山纵一旅旅长王建安说：“顽军乘敌军‘扫荡’，我军主力转移之机，抢占了在我军根据地一些自然天险的崮，并扬言八路军仅凭几挺机枪和一些步枪是无法再想占领这些天险的。现在我旅二团的胜利，用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这些鬼话。顽军抢占我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一切地区必须交还，否则就以天桥崮为榜样，彻底歼灭之！”



纪念我的父亲

李新民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建梓

我的父亲名李建梓，1911年生，家庭是山东省寿光县城名门望族。父亲的爷爷名字叫李祥临，族里人称八老爷，当过清朝七品官。他活了95岁（1948年故去），在当地名望很高。我的爷爷故去较早，父亲兄弟二人，父亲行二，他的哥哥成家不久也过早故去了。由于在家族内父亲的辈份高，族内同龄人都称我的父亲“六叔”。子侄辈参加革命的有李跃辉（曾任福州空军组织部长）、李启辉（曾任新疆军区南疆军分区副政委）、李金城（曾任上海缝纫机厂厂长）年龄与父亲相仿但都叫他六叔，我们算堂兄弟。父亲18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个大媳妇，先后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李明辉，女儿李瑞兰（还有一子三岁就夭折了）。

父亲在中学时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被寿光县中学开除。为求进步，1931年他去北京就读文治中学，1934年考上中国大学（孙中山曾任该校校长），在校期间有幸听过鲁迅先生演讲。他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1935年因日寇入侵，北京掀起抗日高潮，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并担任学生纠察队队长，当时队里还有清华大学学生姚依林。还参加过崔嵬、张瑞芳合演的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活动。在一次去联络站接头时，因联络站被破坏，

在门口被埋伏的军警抓住，关了几天，父亲一口咬定是路过，被放了出来。1936年由李雪峰、齐燕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父亲受党委托回山东老家协助马保三同志（寿光县建党人之一）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组建八路军鲁中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同志担任司令员，父亲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后又任八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山东八路军整编后，父亲任鲁中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二军分区工作过的领导和战友有司令员罗舜初、吴瑞林、胡奇才，政委王一平，一团政委李跃文，还有孙明、王淮湘、迟浩田、马连辉等同志，这支部队发展成长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

“文化大革命”时，济南市总工会主席孙明重病在床，我家住在隔壁，我常去陪他聊天，他跟我谈了很多父亲的情况。他说父亲在二军分区时是大学生，讲话很有水平，做报告干部战士都爱听，为人好，大家有事都喜欢找他谈。武中奇、王一平、周星夫、马连辉等老同志谈到父亲都很敬重。

战争时期环境复杂，父亲家庭也很复杂。父亲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后，家族长辈为保全家族，希望国共两边都有人，由族长八老爷作主，给父亲长子明辉（当年13岁）娶了国民党军张景月部队的参谋长唐锡嘏之妹。因张景月与父亲是中学同学，又是同乡，两军在山东抗战时又合作又斗争。孙明给我讲过父亲在抗日战争时一件事，1939年的一次战斗中，八支队在博山地区遭到日军、伪军重重包围，因寡不敌众，形势十分危急。经八支队党委研究，派父亲为特使，去伪军张景月部做说客，张同意偷偷松开一个口子，让八路军突围。第二天晚上，八支队悄悄突围，保全了实力。因这个社会关系，1943年整风时，父亲被调离军职，转到地方工作，任中共山东鲁中区党委秘书长。那一年与我母亲（八路军女干部、区妇救会长）结婚。后又派到日寇施行“三光”政策最坚苦的沂源县开辟工作，任共产党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他领导沂源县人民用血肉抗击了日寇，建立了人民政权。在鲁中区党委共事过战友有高克亭、邵德孚、江华、霍士廉。父亲文章写得好，毛笔字也好，父亲工作地区的一些布告都是他亲自写。济南战役中，为保证战役胜利，保全济南，减少损失，前指决定策反吴华文部。华野给吴华文的三次劝降信都是父亲起草的，这三封信至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展柜里。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抽调大批山东干部随大军南下，1949年父亲随军进入上海，任中共华东局机关党委行政处处长，1950年任华东局机关党委书记，参加了接管大上海的工作。

1955年高饶事件后，中央决定撤消华东局。父亲不久调至北京，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办公室主任。当时局长是师哲（曾任毛主席俄文秘书），副局长是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张忠实（原延安抗大副校长）、姜春芳（原左联负责人）。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父亲参加了会议。八大闭幕后父亲回到家，又高兴又说很遗憾，闭幕式后毛主席来看望中央机关代表，和大家一一握手，走到父亲身边时，旁边几个代表争先伸出手，结果父亲未能和主席握上手。当晚中央办公厅为会议代表举办京剧晚会，我们家车坐不下，我的好友陈祖莫约我坐他家（陈副局长）车去西苑剧场，那晚剧目是《群英会》。著名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谭富英、裘盛戎都出场了，真是“群英会”。父亲喜欢京剧，在家高兴了也常唱几句，记的他常唱《打渔杀家》中“父女们打鱼在河下”，还要表演一番。会议期间，李富春找父亲谈过话，要父亲准备去鞍山工作。

1957年中央为加强工业基地东北鞍山的领导，父亲被派往鞍山市，任鞍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当时鞍山是一类市，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第二书记袁振（兼鞍山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建祥（右）与战友

经理、党委书记），市长李维民，市委书记杨克冰。他们对父亲印象很好。父亲在鞍山工作时没有官架子，生活一直很简朴，别的常委上班坐专车，父亲却买辆自行车，上下班骑车子。大炼钢铁时每周六到工厂参加劳动，与工人“三同”。大年三十他要和其他干部一起到鞍钢工人食堂为夜班工人包饺子。父亲在艰苦战争环境中得了严重的胃病，在上海住院时做了胃切除大半的手术，身体一直不好。三年困难时期，他不要组织特供照顾，和大家一样生活。1961年父亲在北京开会时发现肝癌，市委领导要他去上海治病，为给组织节约经费，硬是退了飞机票，坐船去上海，那时船要走三天，他还晕船。他放心不下工作，很快就回来了，一边工作，一边养病。

1962年，父亲第二次去上海，在华东医院作了手术，剖腹探查，发现肝癌晚期，广泛转移。当年癌病是不治之症，晚期是非常痛苦。他坚持生活自理，上厕所自己走去。连母亲帮忙他都不要，他不要麻烦别人，竟然临终前一天都做到自己去厕所。有一位老同志来看他，给他捎来了毛主席未发表的六首诗，他便一遍遍抄写，以此来鼓励自己，其中一首是《咏梅》。

1963年1月25日，阴历大年三十晚上，父亲觉的自己不行了，对母亲说“我是大年三十出生的，今天过生日，吃面吧。”厨房做上来，他已经很难受了，但看到面做了，硬撑着吃了一口。母亲看不下去，流着泪说不要吃了，父亲说“这是寿面”。又吃了两口，实在吃不动了，躺下了。第二天是春节，上午11点35分父亲与世长辞，享年52岁。

我们六八六团的九二步兵炮

王 桓

九二步兵炮又叫小钢炮，是我们六八六团唯一的一门曲射、平射杀伤力大，又便于营连步兵携带的火炮。它深受全团官兵的喜爱，也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重武器，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门小钢炮是1939年八路军进入山东鲁西地区，八月间在梁山战斗中缴获的（战斗全歼日本天皇的亲戚、文田政江大队300余人和60名伪军，并缴获意大利野炮两门和日本造九二步兵炮一门，外加掷弹筒3个，轻机枪17挺，并俘获日军3名）这门九二步兵炮便成为我们六八六团的重武器。

那两门意大利野炮则由于笨重不便携带，不适合敌后游击战，故将其拆开埋在野地里，后被日本人找回去了。

九二步兵炮重量才400多斤，用两匹马即可拆开驮运。又有两个车轮，两三个人就可拖它到距敌碉堡围墙一二百米的地方直射轰击。而迫击炮虽轻，但只能曲射，炮弹从空中往下掉，打散兵集中的步兵群效果较好，但是对付工事碉堡效果较差。

九二步兵炮口径70毫米，炮弹8公斤，射程2800米，炮管长790毫米，全高0.62米，便于隐蔽。

梁山战斗中，日本人慌忙把炮弹打光了，当我部队缴获九二步兵炮时，仅剩下3发炮弹。幸好1940年3月间又在鲁南平邑白彦战斗中缴获了敌人270多发九二步兵炮弹。战斗的第二天，九二步兵炮就派上用场，击毁敌人汽车五辆。

1942年3月间，在与盘踞在临沂城西矿坑的王洪九的战斗中，这炮一发炮弹在一丈高的石头墙上打开一丈多宽的缺口。时隔不久，打临沂西涧头时，我九二步兵炮配合五连，一发炮弹将石头围墙炸开，碎石头哗啦啦响了很长时间。

垭上村战斗中九二步兵炮震慑日军

1941年8月，驻扎在连云港的一个日军中队100多人到赣榆县城北我驻区莫家村，在村外一个大庙里安了个据点，妄想阻止我们在兴庄、海头等地收盐

税，团里决定要我们第五连在团九二步兵炮配合下，拔掉这个据点。

乔令川连长与指导员决定组成敢死队，三排排长郭迎照为敢死队队长，他常背着一口大刀，他说：“这回我这把大刀可就要用上了。”

敌人火力很猛，轻重机枪向我们猛烈射击，还有迫击炮、掷弹筒不停地向我阵地轰击。敢死队在火力掩护下运动到冲击出发地，二梯队已进入阵地，连指挥所紧跟在敢死队后面，小钢炮则架在距敌占领的大庙不到100米的民房院里。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们的步兵炮把大殿后墙打开个缺口。

当晚九时许，小钢炮发炮。只见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炮弹从我们头顶飞过，“咣”的一声又是一股黑烟，炮弹在大殿的后墙根爆炸，没击中目标，打近了！紧接着第二发炮弹又在大殿前面爆炸，又没击中目标，又打远了！我们连匍匐在敌人阵地前面，等待第三发炮弹，等了得有十多分钟，也没听见炮弹响，全连就趴在敌人火力下十分着急。又过了20多分钟，上面命令五连撤出战斗。

我们连撤到距莫家村敌新安据点有五里多路的村庄，担任全团全营的前沿警戒任务，团司令部和团直属部队一、二营，都住在埡上村一带。

我们在埡上村附近呆到第三天晚上下半夜三点多，团部所在地埡上村一带突然枪声大作，全连集合在庄头场地上，乔连长派一排去埡上村查看情况。不大一会儿，一个战士回来报告，日本兵趴在埡上村外大堤上向村子里射击，人很多。排长请示怎么办，连长说一排撤回驻地，向连队靠拢。连长和指导员决定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绕开敌人，从我们连驻地沿着埡上村团营驻地东侧绕开敌人向北转移，天亮后，我连已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

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我们的是一个以上的日军联队，我团损失很大，尤其是团直属部队。我们连的炊事班、伙房等为了安全都留在后面跟着营部行动，司务长赫天才、理发员程普金、挑夫老刘都牺牲了，行军锅、油挑子，连首长的行李都丢了。

之后又得知，我们在莫家村动用大炮轰击，虽然没有击中目标，但却震慑了日本鬼子，九二步兵炮对于日军据点是个极大的威胁。为了消除威胁，连云港一个多联队日军偷偷摸摸奔袭驻扎在埡上村的我团，企图抢夺我军的九二步兵炮，但由于我军的坚决回击，敌人没有得逞。



两三发炮弹打得伪和平军七十一旅李亚藩缴枪投降

1943年11月19日晚，我六八六团第一、二营和第二十三团攻进赣榆县城，歼灭了部分敌人。余下的大部分伪军在其旅长李亚藩率领下固守城内核心工事几座大碉堡。滨海军区符竹亭政委写了封信，让一个俘虏送给李亚藩，要求李亚藩缴枪投降。李亚藩仗着工事坚固拒不投降，并派人在炮楼上喊话：八路军没有大炮，有炮就缴枪投降！看到敌人嚣张的样子，符竹亭政委命令炮兵连长李玉章把大炮架在距敌碉堡150米处射击。炮兵们装填炮弹、瞄准、拉动发射皮绳，“咣”的一声，炮弹从碉堡枪眼中射入爆炸，碉堡枪眼中冒出浓烟，死一样半天没一点儿动静。于是又连发两枚炮弹，这时碉堡里有人大喊：不要打了，我们投降！紧接着炮楼里出来两个举手的伪军：我们缴枪。这两个人一个是伪军团长张星三，一个是伪军旅长李亚藩。李亚藩随即下令全部人马放下武器，2000多人的伪七十一旅全部缴枪。

两发炮弹打进石沟崖

日照县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朱信斋带领500多人的汉奸队在日莒公路上的石沟崖安设了据点，这个据点分割了我滨海根据地的南北交通。朱信斋对日本人忠心耿耿，无恶不作，杀害无辜百姓，抢劫人民财产，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1944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早上七时，我们部队向朱信斋固守的石沟崖据点发起进攻。汉奸部队凭借坚固的炮楼、围墙和外壕进行抵抗，我们八连九班班长等好几个同志牺牲在壕沟里。贺东生团长命令炮兵连长李玉章用九二步兵炮轰击，两发炮弹就炸开了据点外墙和碉堡，我第一、二连随即冲进围墙，为了抓活的朱信斋，用辣椒烟熏，结果朱信斋被熏出炮楼，被我军活捉。

九二步兵炮轰击莒县日军炮楼失利

1944年11月14日，伪莒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莫正民率领3500多伪军官兵起义，并配合我攻城部队攻入莒县。城内一个中队的日军龟缩在两大两小四个碉堡内顽抗。我军先打掉了两个小碉堡，但是，两个大碉堡的日军继续抵抗。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下令用九二步兵炮轰击，李玉章连长连打九发炮弹，炮弹击中用青石砌成的碉堡墙上，却只在墙面上炸出个坑，打不下来，人员伤亡很大。这时，一个旅团的日军进入城内增援，陈司令员下令部队撤到城外围困敌人。没过几天，城内的日军撤走了，我们收复了莒县县城。

铁军大帐追歌行 (十)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苏北淮阴——完美收官战

(1945年9月21日——1945年10月28日)

1945年9月6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解放淮阴县城后，更名设立清江市。9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千棵柳移至淮阴县城。据资料显示，华中局和军部旧址在原淮安师范院内的3栋2层楼房中，其中两栋楼办公，一栋为宿舍楼。1995年4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旧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旧址立碑；但是仅仅11年后，于2006年因城市建设改造需要，便将旧址及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至今尚未恢复重建。因此，来至淮阴后，我们寻找了好长时间，问及许多人，终于没有见到新四军军部旧址模样。在此地拆除后重建的是苏皖边区政府旧址。苏皖边区政府是华中局领导下，在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大解放区创建的唯



新四军攻占淮阴
后更名为清江市

一民主联合政府，于1945年11月1日成立。边区政府下辖8个行政区，73个县（其中江苏50个县、安徽20个县、河南3个县），人口2500万，面积10.5万平方公里。边区政府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成立纪念馆，2008年5月1日起对外开放。

新四军军部在淮阴县城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但是，因为华中局和军部的到来，这里一时间成为华中军民进行抗战最后胜利大反攻的指挥中心，成为华中解放区的首府。在这里，在军部指挥下，新四军完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收官之战”——解放盐城。而且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党中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新四军承担的战略任务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从9月下旬起，新四军驻苏南、皖南、浙东的部队分别北撤，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10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关于新四军江南部队奉命北移的报道。新四军军部领导组成人员及部队体制、编制进行了一些重要调整和变动。

一、收复盐城了夙愿，抗日战争大收官

提到盐城，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军部领导，无不怀着极为深刻、深厚的感受与感情。这是苏北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又是在抗战中与新四军军部息息相关的战争之城。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陈毅等人，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这里领导组成了新四军新军部；盐城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而且到抗战结束，整整4年多时间，为了否认国民党政府当年对新四军的诬陷，坚持新四军的合法地位，中央一直只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1941年7月，日寇对盐城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军部在率部进行了极为艰巨激烈的盐城保卫战后，主动撤出了盐城。自此，盐城为日伪所侵占，直到抗战全面大反攻。“两淮”战役胜利结束后，盐城成为苏北解放区内最后一个伪军大据点，妨碍着华中根据地的最后统一。彻底拔掉这个据点，成为华中最后抗战全面彻底胜利的“收官”之战。而且，虽然盐城今后已不可能再成为华中的指挥中心，但是收复盐城，却始终是新四军上上下下的一大夙愿。

这场收官之战，本来应当由坚持在苏北的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来承担，而且黄克诚早就盼望着亲手拔掉这颗最后的钉子。当年日军进攻盐城时，大家当时都更多地考虑丢掉盐城的政治、社会影响，坚持把盐城保卫战打到底。正是黄克诚敢于“直言上谏”力排众议，坚持实事求是，甚至和他尊敬的“顶头上司”陈毅拍着桌子叫了板，军部才放弃了盐城，数年内转战于阜宁、盱眙等地。事实证明，黄克诚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要用今天收复盐城的战果，为当年自己坚持的正确主张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正当他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时，9月23日，却接到了军部的命令，要他率领第三师北上，执行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新的战略任务。他不得不放弃了正在计划中的盐城战役，心中不免有点遗憾。但是军令如山，他坚决而迅速地率部踏上了北进之旅。

10月19日、21日，新四军军部连续3封电令发到了苏中军区，要求他们组织并发起盐城战役，并下令具体任务由苏中3个旅及盐阜军分区部队承担。

根据军部命令，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盐阜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组成战役指挥部，共调集2万余人，包围了盐城及周围附近的敌伪据点。

当时的盐城，由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之第四军1万余人驻守，军长赵云祥。敌军部及下属各部固守在城区及周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主要据点工事较为完整坚固，易守难攻。根据伪军兵力部署，我攻城指挥部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法。

10月30日晚8时，盐城战役外围战打响。在进攻其外围主要据点伍佑、主要守军第三十九师潘子明部时，我遇到了激烈的反抗，未能得手。于是，又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灭其主力、声东击西拔除据点的战法，把敌人主力引出据点来加以消灭，对据点最后守敌再采

用佯攻其此、实攻其彼一举拿下。在这一连串巧妙计策下，10月31晚，我军全歼敌外围伍佑据点三十九师2300余人，师长潘子明当了俘虏。

11月8日，我对盐城发起总攻。敌四军军长赵云祥见外围主力部队已被歼灭，部下多已无心恋战，加上我地方党对其进行反正工作，最终决定与我进行谈判，率部反正，盐城不战而获得解放。

11月11日，新四军攻城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接管盐城。赵云祥率第四军军部和所属第40师共6000多人开出盐城集中整训，不久被编为华中解放第四军。赵云祥前去扬州说服孙良诚向我投诚，结果反而被孙良诚所扣。第四十师师长戴心宽思想进步，被任命为第四军军长。后来这支队伍在我党的教育下，成为一支革命队伍，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有的还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从1945年9月上旬到11月上旬，新四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共歼灭与争取伪军1个军部、6个师、3个旅及地方保安团、队等共计3.8万人，打击了国民党收编伪军的活动，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为后来的反内战增强了物质力量。

二、战略方针应局变，粟裕力让司令员

1945年8月25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奉命从延安返回军部。离开军部已经两年半的时间了，虽然他还是新四军的代军长，虽然他还承担着指挥职责，但是毕竟远离华中，远离战场，远离前线，远离战友，他觉得简直是恍若隔世。他归心似箭，一路疾风，取道太行，转赴华中。

陈毅还人在旅途，8月26日，华中局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电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为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在黄花塘事件的两年半后，陈、饶之争也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从党和新四军的大局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陈毅心胸豁达，顾全大局，回新四军后与饶漱石消除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饶漱石虽然算是如愿以偿、至少是新四军的领导核心之一，但是欲壑难平的个性，终于驱使他在全国解放后不久，走上了自绝之路。那是后话。

在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直至最后彻底胜利之际，党中央高瞻远瞩、未雨绸缪，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确定了我党我军新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提出“因山东八路军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调往东北，由新四军调8万主力到山东和冀东，将江南新四军主力撤返江北。罗荣桓到东北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移至山东，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领导山东和华中两大战略区，原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干部另行配备。

9月26日，南下行至河南濮阳冀鲁豫军区的陈毅，收到了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是23日发出的，因他尚在途中无法联系，因此发给了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电报内容如下：

“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毅、饶漱石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

接到命令后，陈毅在宋任穷的安排护送下，争分夺秒，刻不容缓，日夜兼程，过微山湖，越津浦路，于10月5日到达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临沂。罗荣桓匆匆向陈毅交接了工作，迅即挥师北上，把山东交给了陈毅。

10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黎玉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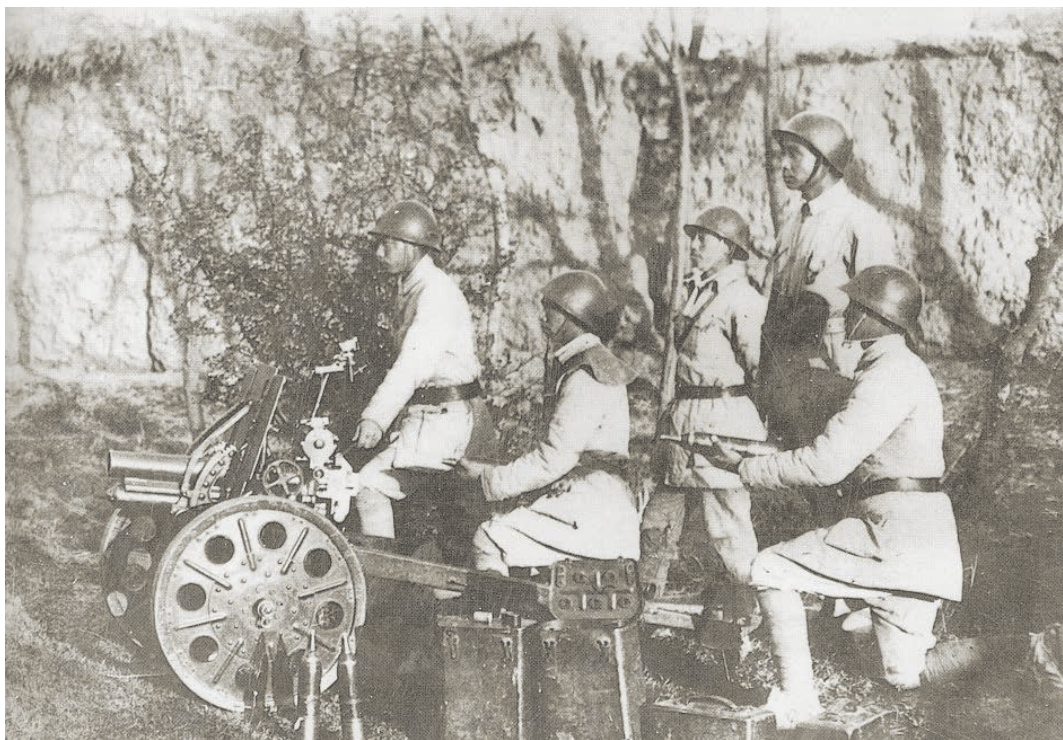
10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为常委，邓子恢为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同时成立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张鼎

丞为副司令员，邓子恢为政治委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然而，一向视“党纪如天”“军令如山”的粟裕，这一次却对党中央对他的任命采取了“抗命不遵”“拒不执行”的态度，却又深深地感动了中央，感动了新四军。其实早在10月6日，华中局就遵照中央指示，提出了成立苏皖军区、并将粟裕留在华中担任苏皖军区司令员的建议。10月8日，党中央就复电华中局：“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随后党中央又决定由延安返回华中的张鼎丞任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任命电报后，立即将电报压了下来。他觉得，由张鼎丞同志担任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第二天，粟裕即发电给党中央：“昨天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而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但是，党中央在24日的复电中却仍然任命他为司令员，这让粟裕更加于心不安。随于10月27日再次致电中央，重申请张鼎丞任司令，他任副司令。中央既为粟裕的精神所感动，也觉得实在“拗”不过，于是于10月29日复电华中局，最终接受了粟裕的请求，由张鼎丞担任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同时，决定将苏皖军区改称为华中军区。

这是粟裕“一让司令”的事情。到了1948年春夏之交，他又来了个“二让司令”：中央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去中原局工作，华野司令员一职由粟裕接任。粟裕再三请求中央保留陈毅在华野的司令员一职，自己甘当副职，获得中央批准。粟裕从革命全局出发，在名誉、职位、权力面前一让再让，充分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境界。

10月28日，设在江苏淮阴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以金冶为队长、张劲夫为临时党委书记的先遣队，开始启程前往山东临沂，任务是为军部迁址打前站，勘察军部到临沂后的驻地，并护送电台和机要人员供陈毅军长使用。随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开始分批迁往临沂。



新四军炮兵部队
准备攻城

模范政委吴岱 (中)

佚名

思想政治工作秘诀

吴岱在四团深入基层的作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经常在连队转，班排开会也去听，和战士谈话，交朋友，战士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有的战士个把月不见政委就想得慌。所以连队不知道的事，组织股不知道的事，他早就知道了。部队可能出现的问题，还在萌芽中就解决了。

有一天，吴岱和一个下岗的战士并肩走着，看这个战士神色不自然，就问这个战士，你们连有人偷了老乡的衣服，知道不知道？

这个战士慌了，吞吞吐吐地说，政委你知道了，可不要讲，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了。原来这个战士的裤子破了，见老乡有条裤子晒在麦垛上，就拿来藏了起来，准备套在军装里面穿。老乡报告了连部，连里就查开了，不少同志还说，偷老乡的东西，查出来一定给他处分。这个战士害怕了，准备开小差。

吴岱问他裤子现在在哪里？那位战士说还藏在麦垛堆里。

吴岱说，大胆承认错误，有错就改，浪子回头金不换，能改正错误的战士是最勇敢的战士。

这个战士从麦堆里找出裤子送到了连部，吴岱又找这个战士谈话，说为了教育大家，你要在军人大会上深刻作个检讨，再关你3天禁闭，好不好？

这个战士说没有意见。后来这个战士真的成了



吴岱夫妇

最勇敢的战士，主动做群众工作，后来还当了干部。

还有一个故事：团特务连有一个战士看守犯人时睡觉，跑了一个犯人。这个战士吓坏了，不吃饭，只是哭。团的锄奸股怀疑是战士把犯人放跑的，要处理这个战士。吴岱政委知道了这件事，仔细地查看了哨位，又和这个战士促膝谈心。

战士说，我不知道关的是什么人，也不认识跑的是谁，犯人不是我故意放跑的，当时因为太困了，打了个盹，结果出事了。

吴岱说，既然你不是有意放跑了犯人，可以不给你处分。可是这是个严重问题，站岗怎么能打盹呢！

战士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讨，他见人就说，要不是政委跟我谈话，我真准备不干了，免得掉了脑袋。

吴岱常向干部们讲，战士带着思想问题上战场，就不能充分发挥战斗积极性。五连有个战士叫赵连壁，是临沭县根据地的人，父母亲都很进步，抗日工作很积极，是个模范军属。他有个媳妇，是村妇救会主任。赵连壁长相虽然不出众，但特点很明显，细长的眼睛，蒜头鼻子，为人快言快语，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是连队的骨干。吴岱每次到五连，赵连壁总是想办法找政委说上几句话。有一天，吴政委又到五连，五连指导员说，不知为什么，赵连壁这几天情绪不好。

吴岱去看他。见到赵连壁，还没开口，赵连壁就说，政委呀，这么多日没见到你，想跑回家看看了。

吴岱笑着问他是不是想媳妇啦？赵连壁说，还想媳妇呢，我都当了“王八”了。

原来赵连壁家里来信，说他媳妇生了小子。可是他怀疑不是他的孩子。

赵连壁满有道理地说，人生出世，当娘的要受十月怀胎之苦，我们八九个月没见过面，哪来的孩子？

吴岱想了想说，孩子一定是你的。

赵连壁问为什么？

吴岱说，现在是7月，去年11月我们住在你村子。十月怀胎是个大概数，还有七活八不活的说法，有早的7个月就生了，也能活，多数男孩是9个月出生。有的女孩10个月还生不下来，所以说孩子一定是你的。

赵连壁还是半信半疑。又过了一个月，吴岱派人到赵连壁家，捎信叫赵连壁的媳妇带着孩子来部队看看。第三天，赵连壁的媳妇到部队来了，过了满月的孩子，虽然还没长开，可是那对眼睛，蒜头鼻子已经很明显，战士们和他开玩笑，说哪里像你不好，为什么偏偏眼睛鼻子像你。

赵连壁高兴地跑了5公里路，给政委送去了8个红皮鸡蛋。

有一次，团决定八连去打一个伪军据点，吴政委随八连去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机枪射手牵拉着脑袋，没有精神，就和这个机枪射手走在一起，赞扬他的枪打得特别好。

机枪射手说，这次打仗我非死不可。吴岱问为什么？机枪射手告诉他，出发的头一天，他到一个老乡家借盆，刚一进门，出来个老大娘，把一盆红水泼在他身上。后来知道，这是她的儿媳妇生孩子的血水。他过去听说过，生孩子的血水最脏，连龙都怕，谁身上溅上了，一定晦气。

吴政委听了，哈哈大笑，就问机枪射手没见过龙？机枪射手说没有。

吴岱告诉他，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龙是人们想象的一种动物。既然没有龙，龙怕血水就是瞎话了，全是迷信。革命战士不信迷信。其实，生孩子的血是最干净的，不干净孩子还能活吗？革命战士最喜欢红，我们八路军战士原来就叫红军，战

旗是红的，帽徽是红的，领章是红的，给战斗英雄戴的花也是红的，我看你溅了一身红水，是该走红运了。你一定能立功，当英雄，戴红花。

一席话把这位机枪射手说乐了。这次战斗，这位机枪射手发挥了最好的射击技术，在掩护部队冲锋时，机枪打得很准，并且还有节奏，伪军听了都叫好，打出了白旗，喊到，听到你们的机枪声，就知道你们是老四团，我们投降。

吴岱做思想工作很细致，干部们都说，吴政委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山东《民兵报》的记者叫他谈谈做思想工作的体会，他说，12个字：实事求是，入情入理，耐心细致。

四团在抗战中，出了不少战斗英雄。也有的犯了错误，凡是可以挽救的，吴岱都把工作做到家。

1944年，山东军区战斗英雄大会，四团有十几个人被授予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工作模范称号。其中有个战士叫高启发，是二营五连的，他炸了几次敌人的碉堡，成了爆破能手。在一次战斗中，他刺死了一个鬼子，缴了一支大盖枪，他用这支大盖枪又打死了许多敌人，成了战斗英雄。他爱自己的大盖枪，把它当成了宝贝。正当山东军区政治部萧华主任进行大会总结时，海陵独立团一个英雄代表美滋滋地摆弄着自己的大盖枪。旁边的同志就问他的大盖枪在哪里得的。那位英雄得意地说，在演马庄战斗中得的，并夸耀枪说有多么好。高启发听见了，说你的大盖再好，也比不上我的，还说，不好好听报告，显摆什么！那位代表没理他，又从刺刀鞘里抽出刺刀夸耀。高启发火了，抽出刺刀砍过去，把那位英雄的新刺刀砍了个大豁口。俩人在会场上打了起来。为这件事，会上当即宣布取消了他俩的战斗英雄称号。

在英模大会上打架，当然不对，但就此取消称号，吴岱觉得非常遗憾。在一次会议上，吴岱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了。

滨海军区符竹庭政委也觉得高启发战斗勇敢，不怕牺牲，完成了许多艰巨任务，因为一时感情冲动和同志打了一次架，虽然影响不好，并没有造成损失，因



此，取消战斗英雄称号，值得慎重考虑。

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是大会秘书长，觉得吴岱和符竹庭的意见有道理，就让吴岱说个具体意见。

吴岱说，高启发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他在会场上的表现，暴露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英模人物中间有代表性，必须进行教育。会后，四团准备把这次参加群英大会的代表，集中起来学习一个星期，深入地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要求他们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提高自己，不做一时英雄，要做一世英雄。会上已经宣布取消他的战斗英雄称号也不能不算数。我们对他加强教育，他认识得好，建议恢复他的战斗英雄称号。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吴岱的意见。

高启发是个火爆脾气，因为打架丢了英雄称号，憋了一肚子气。在英模代表集训班里，别人都是英雄模范，自己仅仅是代表，觉得比别人低一头，经常火不打一处来，又和炊事班打了一架，就连高启发本人也痛恨自己的坏脾气，从此干什么事都不愿出头。

不久，二营去打敌人的据点。伪军的几个炮楼都打下了，就剩日军的一个大碉堡，很坚固，敌人的火力又强，几个送炸药的都没完成任务。教导员徐伟要高启发上。高启发说，还是叫战斗英雄上吧。教导员便许若打下这个碉堡，恢复他的战斗英雄称号。

高启发一听来了精神。徐伟要组织火力掩护他，他说，用不着，火力掩护，碉堡打下了算谁的？把队伍撤下去，有我一个人就行。

其实，高启发早就心里有数。他把两大包炸药捆在一起，躲在碉堡旁边的小房子里，碉堡里的敌人，只注意攻击部队，部队往下撤时，还在用火力进行追击。高启发一个箭步，从小房里窜出来，把两个炸药包安在碉堡根上，敌人发觉时，从碉堡往下投手榴弹，高启发早已回到小房里，一声巨响，碉堡炸塌了。

战后。徐伟找吴岱政委问怎么办。吴岱说，答应给他恢复战斗英雄称号，说话得算数。

徐伟为难地说，我哪有这个权力。吴岱觉得是时候了，叫警卫员把战斗英雄大会发给高启发的奖品拿来，交给徐伟，要他回营宣布恢复高启发的战斗英雄称号。同时要他告诉高启发，英雄模范要成为群众的带头人，八路军提倡革命的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要他做一世英雄。

老四团在沐河两岸出名，得到群众的拥护，不仅因为仗打得好，纪律严明也是重要原因。

1943年5月，滨海军区的赣榆北部和甲子山地区，土匪又猖獗起来，时有抢劫事件发生。有的土匪还冒充八路军，对我军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为了巩固根据地，彻底清除匪患，四团奉命清除马陵山区的土匪。在半个月之内，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配合政治攻势，消灭土匪200余人，重新恢复了这个地区的民主秩序。

一次，四团在土匪比较多的山区剿匪。这个山区，敌人没有占领，八路军来的比较少，群众觉悟不高，也没组织起来。剿匪战斗，部队很分散，大部分是以排为单位活动。这天，九连二排在一个叫秦庄湖的大村，包围一股土匪，战斗中，二排长被土匪头一枪打中胸部，伤势很重。副排长命令五班刘立忠找担架把排长送回团急救。刘立忠找了两个老乡，抬着排长刚撤下战场，对面又来了几个土匪，朝着担架就开枪，刘立忠马上还击。这时，抬担架的一个老乡丢下担架拔腿就跑，刘立忠怎么喊也不行，就鸣枪警告，结果一枪击中老乡的胸部，老乡倒下后当即死亡。

打完仗，这个老乡的母亲疯疯颠颠地到处喊，说八路军打死了她的儿子。在秦庄湖集上，赶集的人不明真相，一传十，十传百，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知道八路军

向老百姓开枪，严重影响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工作。

吴岱派人调查，刘立忠自动找吴政委坦白交待。刘立忠也是四团的一个战斗英雄，吴政委很喜欢这个班长。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口才也好，能说会道。每次到九连，都要和刘立忠谈谈话，是个干部提拔对象。吴岱问刘立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刘立忠深明大义，坦然地说，来以前想过了，杀人要偿命，因为自己的错误，影响了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愿意用生命挽回影响。

吴岱先把他关了起来。但作为团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吴岱还是为难了。放了刘立忠，难以挽回他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杀了他，又实在舍不得。有一天，吴岱去看刘立忠，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刘立忠看出政委的心情，就劝吴岱不要为难，说他这也是为革命而死。

吴岱也没有办法，只好挥泪忍痛枪毙战斗英雄了，就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刘立忠说他死不足惜，只是不要开除他的党籍。

经过上级批准，决定当众枪毙刘立忠。在秦庄湖逢集的日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刘立忠。参加大会的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人。会上，吴岱向刘立忠详细提问了打死群众的过程，刘立忠一一准确回答。最后吴岱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此时刘立忠被五花大绑，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站在台上，面对群众，大义凛然地说，乡亲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为解放老百姓打鬼子的，我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辜负了党的教育，没有履行我的使命，打死了老乡，造成了群众的痛苦，我愿以命抵命，希望大家接受我的教训。我要求死后在我的坟头上立块碑，写上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刘立忠。他说完话，回过头来，向吴岱深深一鞠躬，大步走向刑场。

就在这时，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登上讲台，眼含热泪地说，多好的孩子，不能杀呀，留着 he 打鬼子吧！老人转过身向台下的群众说，八路军的这位班长，不是有意杀害老百姓，我愿意担保！台下的群众也一齐喊，留下他打鬼子，我们愿担保！顿时，群众堵住了刘立忠奔赴刑场的路……

司马睿：建立东晋的短命皇帝

劳富平



晋元帝司马睿（276年—323年），字景文，东晋的开国皇帝（318年—323年在位）。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伉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覲之子，晋武帝司马炎从子。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旁系亲属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太熙元年（290）司马覲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继立的司马衷（司马炎次子）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庶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今临沂）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邾战争，年29岁。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邾，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邾。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赶往琅邪。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

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像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跟。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向他靠拢、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江南士族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江南士族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江南士族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全力经营江南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汉赵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

进一步的扩大。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由于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北方传来石勒（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扰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100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王与马共天下

建武二年（318）4月23日，晋愍帝死于汉赵的讣告传到江东，司马睿于4月26日即皇位（“上尊号”），改元太兴。东晋据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

司马睿即位后，因为在皇族中声望不够，势力单薄，所以得不到南北士族的支持，皇位不稳。但是，他重用了王导。王导运用策略，使南方士族支持司马睿，使北方南迁的士族也决意拥护司马睿，稳定了东晋政权，维持了偏安局面。司马睿十分感激王导，任他为宰相，执掌朝政。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42岁的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



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王敦是司马炎的女婿，且“素有重名”。拥立司马睿称帝后，王敦“专任闾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在武昌起兵叛乱，江南大族沈充也起兵响应。关键时刻，守城将周札开门投降，王敦兵不血刃就打进了石头城。司马睿忙命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夺回石头城，但均遭大败。无奈之下，司马睿“脱戎衣，着朝服”，对王敦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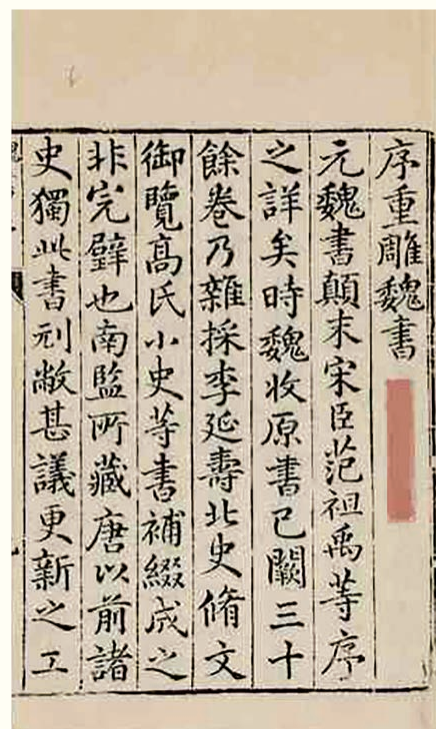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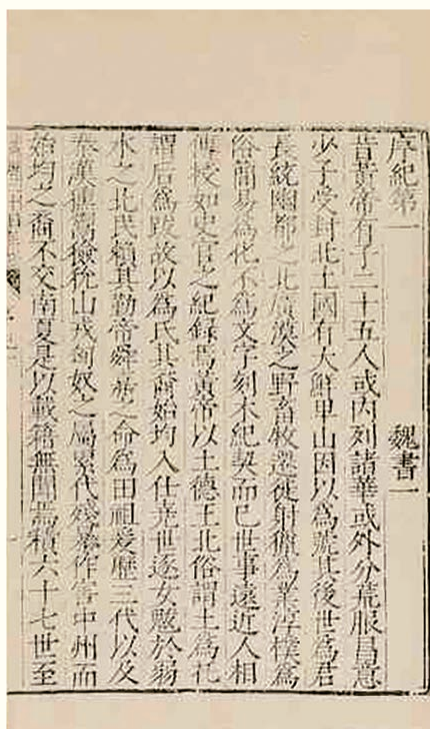
司马睿近似哀求的话，并没有抚平王敦的狼子野心。不久，王敦便自己为自己加官进爵，“敦乃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司马睿征讨王敦时，曾下令“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而王敦却把自己“封武昌郡公，邑万户”，无疑又将司马睿嘲弄了一番。司马睿称帝前积累的那点人气，如今已是荡然无存；皇帝徒具虚名而已，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王敦看到太子司马绍有勇有谋，便想以不孝而废之，后因百官皆不从而作罢。四月，王敦还师武昌，遥控朝政。七月，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此后，王敦更加猖狂，以至于“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司马睿和他的朝廷显然成了摆设。

司马睿眼睁睁地看着王敦飞扬跋扈，逼辱朝廷，蔑视皇权，却没有一点办法。永昌元年（322）闰十一月，在位仅4年多的司马睿在极度郁闷和窝囊中病死在宫中，时年47岁。

东晋皇帝司马睿身世之谜

台湾知府

司马睿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是司马懿第五个儿子司马伷的孙子，继承了父亲司马觐的琅琊王位。本来是轮不到司马睿做皇帝的，不过后来他在西晋摇摇欲坠的时候率大军南下江东，开辟了一片根据地。公元313年，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司马邺在长安称帝，这样算起来，司马邺还要叫司马睿一声叔叔，这位叔叔可没有管过侄儿的生死，当然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司马睿想管也管不了。司马邺继位刚刚三年，就被匈奴汉国皇帝刘聪的大将刘曜俘虏了，做了亡国之君，这个消息对于南方司马睿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不过司马睿也不敢明着继承皇位。晋愍帝司马邺被虏的第二年，司马睿改元称王，构建了东晋王朝的政治框架，直到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大臣刘琨、段匹磾、刘翰等180多人劝进之下，即皇帝位。



司马睿虽然偏安南方当上了皇帝，但是他的身世却备受争议，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中记载：“僭晋司马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伧，伧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魏书》是北朝时期的史书，四世纪时少数民族拓跋氏在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北魏”，《魏书》记载的就是这段时期的历史。《魏书》中的这段记载，大致意思是司马睿是晋将牛金之子，当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琊武王司马伧，司马伧生琅邪恭王司马觐，根据《晋书》的记载，司马觐的王妃叫“夏侯光姬”，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曾孙女，与牛金私通，生下了司马睿，因此冒姓司马，仍然是司马觐的儿子。

司马睿是不是司马家的后代，对于后世来说很难考证，只能从有限的史书中寻找足迹。首先，《魏书》称司马睿是“僭晋”，说明《魏书》是不承认司马睿的合法性，不承认东晋的正统地位，有诽谤之意；其次，牛金是曹魏大将，并非晋将，司马懿生前没有称帝，牛金怎么可能是晋将呢？当然不排除晋朝建国以后，也有叫牛金的将领。唐代名相房玄龄主编的《晋书》也有这样的记载：“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意思是说司马懿从一本谶书上看到“牛继马后”，很忌讳姓牛的人，司马懿命令手下将领牛金给毒死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魏书》中的牛金就是指的曹魏将领牛金，而司马觐出生的时候，司马懿已经过世了，夏侯光姬怎么可能和死在司马懿之前的牛金私通呢？很明显《魏书》的记载不可靠。

不过《晋书》认为司马睿是夏侯光姬和一个牛姓的小吏所生，这一下使司马睿的身世之谜陷入死胡同，很难查找到真相，毕竟这位牛姓小吏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不过个人认为，既然夏侯光姬和这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事情被后世的史学家写到史书中，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事情的话，司马觐怎么可能让司马睿继承他的爵位呢？不过也不排除司马觐为了家丑不外扬，把这件事给忍了。《晋书》对于这件事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称“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就是说司马睿是夏侯光姬和牛氏所生，跟先前司马懿看到的谶书“牛继马后”相符合，正因为这两件事情恰好对得上号，才让司马睿并非司马家后代成了一件真事。

一个人俘虏伪军一个连

——记一等战斗英雄安保全

高雷



英雄被定格在23岁。一位走过八年抗战历程的年轻老八路，为了光复鲁南，解放枣庄，黎明前夜，倒在了那片血染的土地上。他的名字在鲁南抗日根据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安保全。独自一人，竟然俘虏伪军一个连。他牺牲后，鲁南军区沉痛的发出讣告。讣告说：“九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安保全是一个坚强的机智勇敢的模范军人。”

安保全是山西临汾县人，贫苦农家出身。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先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洪洞县曲亭镇，14岁的他被这支军容整洁、歌声嘹亮的队伍吸引住了，他粘缠上了一位背着匣子枪的首长，要参加八路。首长端详眼前这位衣服上打满了补丁、头发象一团乱棕、一双大眼睛的孩子，委婉地拒绝：“长大了再当八路军嘛！”他不依不饶，铁了心的非要当八路不可，哀求了一天一夜。

小屁孩就这样当上了老八路，他开始当通讯员，娃娃脸上从早到晚挂着笑，跟在连长、指导员后面，屁颠屁颠的。后来当司号员，开始学吹号，力气小，嘴巴对着军号，怎么用力量也吹不响。他向连长说：“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就是吹不响，还是让我去拿枪打冲锋吧！”

连长说：“没有号可不行，起床听号，开饭听号，打仗冲锋更要听号，你这小号官，比俺当连长的都神气！”

安保全说：“吹号是好玩儿，可就是吹不响！”

连长说：“吹，使劲吹，吃奶的劲全拿出来吹！”

于是，安保全每天早早起来，跑到山沟沟里练吹号。在村子里练吹号，怕影响百姓睡觉，就趴在井口对着井下吹号。苦练，使他很快成了一名合格的号兵。

1944年2月，伪“和平救国军”军长荣子恒，亲率1000多人开进鲁南抗日根据地抢粮。夜间，傲慢的敌人住在陡沟庄，被八路军鲁南军区五团包围了。接着战斗就打响了，勇猛的八路军连续作战，夺取了所有的山头 and 河崖，把敌人全部压进了山底下的陡沟庄。第二天，太阳偏西的时候，手榴弹已经可以扔进庄里，敌人的战斗意志瞬间被瓦解。一阵急切的冲锋号，伴随着一片“杀啊！”的喊声，敌人从南门一涌而出，你拥我挤，跌跌撞撞，落荒而逃。我们的机枪呼啸着，山沟里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疲于奔命的敌人全然不顾，山头、河滩、小树林，哪里好跑，敌人就往哪里窜。追击敌人的战士们，最后也是七零八落，班不成班了，排也不成排了。

安保全冲在最前面，边追边扔出手榴弹。在硝烟中，他追上了一个挑着菜篮子的伙夫，大喝一声“站住”，鬼头鬼脑的伙夫回头一看，是一个孩子八路，转头急窜，两个篮子左右摇摆，安保全一个箭步赶上就是一个突刺，拔出刺刀，看也没看，继续旋风似地朝前追去，前面，一个伪军官边跑边骂，吆喝伪军们停下，掩护他逃命。安保全对准军官的肚子又是一刺刀。

追击中，安保全看到，班长瞄准一个扛掷弹筒的伪军，“呼”的一枪，子弹打在了炮弹上，“轰”的一声，伪军被炸得无影无踪，班长从血堆里捡起了掷弹筒。

战场上，副班长与一个黑大个伪军争夺机关枪，两个人相互用力，团团转，黑大个一松手，副班长抱着机枪仰倒在地，对准黑大个就是一个点射。

山野里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步枪、子弹。前面追击的战士们没人稀罕。安保全自付：“这回最少要夺一挺机关枪，千万不能空着手回去。”

敌人沿着河道，像惊了群的鸭子一样向前扑腾着，“老跟在后面不是办法。”安保全跳上河崖，奔向山坡，他要翻过这座山，截在敌人前面。

安保全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向山坳里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山那边也有一条很窄的河沟，河沟里一大群敌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正向这边跑来，夕阳下，刺刀和机关枪闪闪发亮，越来越近。

他站在光秃秃的山头上，四周连一块石头也没有，一个人，一支枪，一个半路上捡来的掷弹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第一反应是扔出掷弹筒，然后趁势跑掉，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站住了，散开了，卧倒了。机关枪的脖子伸得老长，瞄准他。他歪着头数了一下，一挺，两挺，三挺，四挺。

他后来对战友说：“跑？这时候你有十条命也跑不掉啊！”

山风袭来，吹得脚下的枯草簌簌作响，卷起了他的衣襟。他挺直身板，变了腔地高喊到：“喂！弟兄们都听着呵，你们赶快缴枪，我们是优待俘虏的，缴了枪不杀你们，快把枪放下！”

太阳平西了，远处的枪炮声，喊杀声衬托出此处的寂静，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敌人不答话，不开枪，不动弹。安保全胆子反而更大了，他继续喊道：“弟兄们，快快缴枪呵！缴了枪一定优待你们。我从前也和你们是一伙，你看，我被八路军俘虏过来，这不好好的当了八路军吗？”他14岁就参加抗战，什么时候当过伪军？他在使诡。

敌人开始动摇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又喊了一遍，两遍，三遍，喊得更

慢，声音也更恳切了。

一个留有分头的军官站起身来，连说：“好，好。我认得你，我叫弟兄们缴枪。”

伪军官反过身去，发出了口令。敌人“呼呼啦啦”站立起来，放下了枪，放下了子弹，放下了一切武器。安保全命令他们转过身，坐下。

安保全跳下山坡，端起一挺捷克式机枪，对准快要落地的太阳，一搂扳机，“嗒嗒嗒”就放了一梭子。既是高兴，也是向战友们发出了信号。放下武器的伪军们静静地坐在山沟里，眼瞅着面前的孩子八路，把步枪枪栓一个个卸下，捆在一起，把4挺机枪的机头摘下，放进碗袋，敲得里面的搪瓷缸子当当直响。

安保全小小的年纪，独自一人机智勇敢俘敌一个连！传遍了鲁南，传遍了山东。

陡沟庄战斗后，安保全出席了鲁南军区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被鲁南军区授予“青年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在100多位英雄和模范中，他年龄最小，而他在会上作报告时，引起阵阵笑声。他传奇的故事，让许多人捧腹大笑。1944年8月，他出席了山东军区首届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班长，但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娃样，有时战士不听话，他就骂两句。人家说：“班长还骂人，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会没有？”他脸一红不说了。他就是这么个孩子似的班长。

1946年1月，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由贾汪地区东犯，进占黄邱套山区及岫岙、侯孟、泉源、张家庄一线。8日，我军为保卫山东根据地，改善前沿斗争态势，决定反击出犯之敌，山东野战军八师奉命奔赴运河南，夺回黄邱套山区。

已经担任五连二排排长的安保全，根据连长的命令，率领全排飞速赶到了运河南山。经过一场激战，夺取了敌人据守的东南高地。

夜幕降临了，周围的山头和村庄，响起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安保全带领两个班，在山下的十字沟边上埋伏好，独自一人摸到阵地前沿观察地形。

安保全踏着荆棘丛生的山地，摸索着前进。感觉有人跟在了身后，他停住了脚步，突然身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气喘吁吁地问：“老弟，你是哪部分的？”

“陌生的声音。是敌人！”安保全波澜不惊，反守为攻问道：“谁呀？”

“我们是增援的。八路已经上来啦！”

安保全不紧不慢地转过身来，夜色中看到黑乎乎一片，有二三十人。“八路上来了？”他装作大吃一惊。

空气凝固了，敌人发觉那里有点不对头，不由得后退几步，“哗啦”打开了枪机，厉声喝问：“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哗啦啦”，紧接着周围响起一片拉枪栓声。

安保全身经百战，具有特强的应变能力。他索性慢腾腾地坐到一块枯石上，讥笑说：“未见八路的影子，看把你们吓得这个小样！”一句话，把敌人说懵了。安保全接着提高嗓门喊道：“弟兄们当心，八路上来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暴露！”

埋伏在十字沟边上的战士，刚才已经听到隐约的枪栓声，正在惊疑，忽然听到排长这样一喊，知道排长碰上敌人了。

被我军打得惊慌失措的敌人，听安保全这样一喊，还真认为是自己人。其中一个说道：“喂，你是高地上的人吧？我们就是来增援你们的。”

安保全心里暗自高兴。高地被我们拿下了，敌人还蒙在鼓里呢！他站起身来，催促说：“既然是来增援的弟兄，跟我来就是了。”

敌人在夜色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安保全朝高地走。安保全一面加快步伐，一面嘲笑地说：“看你们，磨磨蹭蹭的。”

伏击的战士听到排长的话音，都屏住呼吸，一齐把枪口瞄准敌人。眼看就要接近我军阵地了，安保全猛地飞跑几步，跃进工事，大吼一声：“打！”

刹那间，枪声大作，弹雨纷飞，这股敌人大都被击毙，两个负伤的当了俘虏。

国共停战协议签订以后，国民党军利用枣庄这个桥头堡，不断派兵向山东解放区发起挑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陈毅司令员命令：山东野战军八师和华中七师，共同攻打枣庄，坚决拔除这个毒瘤！

1946年6月9日，八师二十三团对枣庄发起了攻击。安保全带领突击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用小炸药包、手榴弹开路，五分钟突破了敌人带电的铁丝网和壕沟，炸塌了敌人的围墙。突破口正面的敌人拚命进行挣扎。楼房顶碉堡里吐出一条条火舌，突击排被敌人火力压在突破口的一堵墙下。安保全第一个爬上围墙，他身子一晃，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紧跟在后面的五班副班长杜长青，发现安保全的衣袖上红了一截，急忙说：“排长！你……”

“没什么，砖头碰的！”安保全示意他不要做声，跃起身来，第一个向前冲去。

接近中兴公司大楼，绝望的敌人困兽犹斗，成群成堆开始了反冲锋，安保全大喊一声，冲进敌群，一刺刀捅进前头一个敌人的胸膛。另一个敌人从左侧向安保全刺来，他身子一闪，一个侧击砸烂了那家伙的脑袋。后续的战士们不断冲了上来，敌人被逼回了大楼。

楼房顶上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安保全正要向里冲，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肩膀。他两眼一阵黑，趑趄趑趄，挺起身来，高声喊着：“同志们，冲啊！”奋力向楼房冲去。

安保全冲到楼房跟前，抡起枪托，“咣”地砸开一扇玻璃窗，纵身跳了进去。



日军占领下的枣庄
中兴公司

正准备转弯上楼时，发现楼梯口露出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安保全急忙向后一摆手，叫战士们闪到一旁，他向楼梯上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趁手榴弹爆炸腾起的烟雾，冲上二楼。

每间房屋，每个墙角，都成了白刃格斗的战场，敌人跳楼的跳楼，投降的投降。楼顶碉堡里的敌人见我军占领了二楼，慌忙掉转机枪对楼下扫射，安保全不幸再一次负伤。

战士们杀奔三楼，冲上了楼顶。“轰！”一声，敌碉堡飞上了天。

经过一夜战斗，守敌被我全歼，枣庄解放了。山东野战军八师二十三团二营五连，在战斗中有72人负伤，44人没有下火线。不幸的是，突击排长战斗英雄安保全，在两次负伤后仍坚持战斗，第三次中弹，壮烈牺牲在了胜利的前夜！

战后，指导员在他的背包里找到了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上面写着：“这次战斗一定很机（激）烈，我已抱着一定牺牲的决心……”

安保全生前系八师二十三团二营五连二排排长。战斗中五次负伤。为了纪念安保全同志，军区命名他所在的排为“安保全排”，领导机关为他谱写了纪念歌曲《我们的排长安保全》。歌词为：

鬼子大败平型关，
消息传来好喜欢，
不辞爹娘离家乡，
丢开草篮上火线。
14岁年纪人嫌小，
两眼流泪不回还。
从此立志当英雄，
战斗灵活又勇敢。
党培养你成了英雄，
我们的排长安保全。

菜熟换钱买旱烟，
全排生活得改善。

枣庄烟筒冒黑烟，
我军愤怒把敌歼，
突击冲锋你在先，
受伤两次你不管，
指挥同志把楼占，
为人民解放流尽血，
我们的排长安保全！

陡沟庄外敌丧胆，
丧胆敌人四处窜，
没有缴获心发急，
远离队伍跑上山。
山腰敌人发了慌，
枪口一齐朝向前。
急中生智把敌骗，
单人缴枪一个连。
惊人的事迹震四方，
安保全名字山东传。
李村郊外春风暖，
领导战士来生产，
凑钱买种把粪拾，
嘻嘻嚷嚷种菜园，

你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亲爱的的排长安保全！
仇恨像火一样燃烧，
我们将在战斗里高喊：
还我们的英雄安保全！
还我们的英雄安保全！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谈艺论画真知灼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先的国画转攻山水，不仅产量多，而且题材不断扩大，技法也有发展变化。后来当人们谈论这个话题，向他请教时，他胸有成竹地回答：

中国山水画，是以中国传统笔墨为基础，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来表现画家的审美艺术观和思想感情的艺术。在国画中，山水画无论是从表现题材的丰富，表现技法的成熟，还是艺术形式的多样和完美，都可以作为杰出的代表而占有重要的位置。山水画从隋唐开始成为独立画科，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到北宋山水画大兴，名家辈出，如：李成、关仝、范宽等（北方山水画派），董源、巨然及米芾父子等（南方山水画派）。南北争相辉映达到高峰。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发展，涌现出很多在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山水大师。经过历代艺术家的不断努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体系。不同时代的画家，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他们时期的艺术作品。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何将自己置身于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去表现山水画的时代性、民族性？怎样正确认识理解山水画的传统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研究的课题。

传统是历代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积累和创



作的结果，是智慧的结晶。所以，传统是中国画发展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对后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在学习传统方面，我选择合于性情的作品。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北宗山水，我经常到故宫去观赏临摹李成、范宽的作品；到中年以后，我到南方去写生，为了画好江南的山水，我又学习了王维、荆浩、关仝等的南宗山水，以及岭南画派的山水。因为喜爱，作品在心中是活的，而不是机械的，学习就有了兴趣，也有了实际意义。通过大量的临摹，用不同的方法反复实践和品味它的山石结构规律，用心去体味揣摩它的笔墨变化，经过不断地读与临，反复认识，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印画于心，日积月累，混沌的感觉中生长出一种带专业性的直觉，从技术上锤炼了眼光和能力。当自我依托于传统，就能感受到绘画之途是宽广坦荡的。

在掌握了传统技法，有坚实的基础后，在创作上还要坚持师法自然造化，以大自然为摄取题材的源泉，在山水间发现新的表现对象，这是艺术的本能追求。黄宾虹大师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春夏秋冬四时之景不同，阴晴雨雪有多种情致的美。在大自然中，到处都可以发现数不尽的题材，并发现别人未曾表现过的有意味的形式美感，从而激发创作灵感。比如，到沂蒙山我才发现群崮，它峭拔壁立，如高高帽子扣于山峰顶上。这不同于南方的山，北方其他地区也没有。我在山水画中画了崮，并着力表现它独特的美。只有到生活中去写生，才能了解山、石、树木、云、水、屋宇的结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训练提高表现自然景物的方法和能力。

有一次去皮府拜访，谈起近年青年画者倡言创新，并标榜自己之作为创新之作，笔者向之先请教有何看法，之先坦言：

古今中外的艺术史、科技史，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社会在前进，艺术是有前瞻性的，也必须创新、发展，与时俱进。老是临摹古人，抄袭别人，跟在别人后面，不会成为大画家。但创新要有一个基点，有传统才能创新。没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今有的年轻人，把传统说得一钱不值，要送进博物馆，这样妄自菲薄，我不能赞同。我画钟馗，如果不看不学高其佩、罗聘、任伯年、徐悲鸿画的钟馗，就画不出我心目中的钟馗；如果不看戏剧《钟馗嫁妹》，就没有我的人物长卷《钟馗嫁妹图》。

创新不单是绘画的形式、技法问题，也包括题材和内容。古人的山水画都表现小桥流水之类，而现代的山水画家则画长城、画水利工程、画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这也是一种创新。如果只把眼光放在小技小巧的探索，如怎样把纸揉绉，怎样在水墨、颜色上撒盐等，这是不能成大气候的。

创新还有个尺度问题。预言家式的创新离地平线太远了。比如说“超时空绘画”“宇宙绘画”。宇宙你如何把握？超时空怎样落笔？与现实生活距离太远，人们无法去实践。创新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延伸，延伸是一米一米地逐步延伸，才能达到目的。

怎样创新？融合是一种途径。有人反对与西画融合，一味排外是不对的。毛主席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在中央美院学过西画，素描、水彩、水粉、油画，我都画过，有一定基础。我画国画的人物和山水，就吸取了西画的结构造型、透视关系、光色表现法等，使物象更具有立体感、空间感。

之先强调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重要性。他在为王小古先生逝世20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画魂》中说：“王小古在绘画上，大多画牡丹和葡萄等，牡丹尤其传神精到。为观察花卉的生长规律，他在自家庭院中栽种牡丹，朝夕观察风、晴、雨、露下牡丹的各种形态，审视体味。尤其晚年他多次去牡丹之乡菏泽写生。万亩芬芳，

百花争艳。他在花海中徜徉，艺术思想和创作进一步升华，得花王之真谛，传牡丹之神魂。观其晚年所作牡丹极其富丽高雅，满纸飘香。无论是风晴雨露千姿百态，各臻其妙，在国画坛上独领风骚。他的作品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首都的部分宾馆、济南的许多宾馆，以及海内外许多单位与友人收藏。”

他在《徐悲鸿先生山东行》一文中写道：“徐先生坚持同水利工程民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在工地现场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廖静文师母在回忆徐先生文章中说：他看到数十万民工直接参加这项建设，感到精神振奋。特别是在施工的各个阶段中，涌现出无数劳动模范，他们的表现简直如同奇迹，令人难以想象，更激起了悲鸿的热情，他们为他画了素描肖像，还在工地画了许多速写。”

之先特别重视画外功，注重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在纪念王小古的文章《画魂》中说：“小古先生的画格极高，究其源乃得力于他的书法和诗词修养以及历史知识。他书画、琴棋、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因而具备了坚实的画外功夫。他的画充满诗意，构思新奇，笔墨滋润，每条线都体现出书法美，这是他的作品高于一般人的原因。有些同志只知画画，不涉猎其他领域，致使画艺很难增长。我们应向小古先生学习，加强多方面修养，才能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



季氏与费县 (下)

丁兆铭

三、季氏与孔子

季氏从季友到季康子（肥）八代人，六任正卿，辅佐了12位鲁君，执政200多年，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和取得的辉煌政绩，《左传》中记载较详。但季氏的执政理念、思想，《左传》和其他史书中却语焉不详，很少记载和评价。而季氏和孔子的交往及言论，（特别是《论语》）却恰好填补了《左传》等史书此方面记载之不足。所以，探讨一下季氏与孔子的关系，除了研究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私交之外，还可以从侧面了解季氏思想的某些本质方面。

季氏与孔子同为鲁国人，又曾同为鲁国执政者，两家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主要生活在季平子（意如）、季桓子（斯）、季康子（肥）时期。

《春秋三传》《论语》《孔子家语》等书也主要记载了他们这个时期的言论及内政外交等交往活动，表现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这时，季文子（行父）已经去世16年（卒于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论语》中孔子对季文子凡事“三思而后行”的评论，已是孔子成年以后对古人的评价了。这时，季武子（宿）已执政16年。季武子于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卒，是年孔子18岁。季武子时代，孔子在政治上还不可能有所作为，思想学术上也还未成熟而出名。此后季平子（意如）执政28年，前期孔子仍然默默无闻，一直到季平子执政后期（去世前五年），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孔子44岁，任鲁国司寇之职时，《左传》才第一次记述孔子之事。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东巡鄆邑，卒于返国的路上。季桓子（斯）执政，于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12年），配合鲁定公、孔子，积极参与了著名的以“强公室，卑私家”为政治目标的“堕三都”（季孙氏之郈邑），叔孙氏之郕邑，孟孙氏之鄆邑行动，并基本取得了成功。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卒，孔子当年61岁，尚在周游列国。季康子（肥）执政，召回孔子（但未重用）。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其后三年，战国始。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季康子卒，晚孔子11年离世。执政13年。《春秋》记事到此亦止。

季氏和孔子的关系可谓渊源既深，由来已久。首先，季氏对孔子有知遇之恩。《史记·孔子世家》转述《孔子家语》载：孔子年轻时，曾寄食于季氏，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按赵歧的解释，孔子担任的是季家主管仓库之吏，负责粮食的入库出库的工作，并为家主季氏收取利息。后来从季氏家出来，做了司空，这很有可能离不开季氏的推荐。按时间推算，这时孔子应是二三十岁的光景，为季平子执政时期。季氏对孔子的知遇之恩还不仅如此。孔子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尤其是后半生，更是颠沛流离。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已61岁，季桓子病重，临终前，特遗嘱庶子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史记·孔子世家》）季桓子临终遗嘱继承人当政后必要召回此时尚在周游列国的孔子加以任用，可见季氏对孔子的信任和看重。据《孔子家语》：“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已有才而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这时，孔子已在列国游学14年，经季氏力荐，回到鲁国，虽然后来仍未被重用，却能看出季氏对孔子的知遇之恩。关系非同一般。同时，他们的私交也是亲密的。

《论语·乡党》记载了一则季康子赠药给孔子的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也未达，不敢尝。”有意思的是，孔子很郑重地接受了，却又说，在不了解药性的情况下不敢服用，流露出戒备之心。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生活交往的细节，充分体现季氏对孔子关心得细致入微，反映出两人感情的不一般。关于两家私交，孔子对季氏有时甚至到了直接干预家事的程度。《孔子家语》载：“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珣璠殓……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而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季桓子要用鲁君赐赠的珣璠珠玉陪葬季平子，孔子阻止。认为，这等于要把先人的尸体暴露在荒野地面之上。理由是，陪葬国君赏赠的价值连城的宝贝，必会引起奸民的逐利之念，从而会为争利而盗墓。这既无益于死者，也非孝子所为。当然，孔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等级名分的“礼”。因为按当时的等级名分，国君可以陪葬此类宝玉，而辅臣要用，则是僭于礼的。但是，此事毕竟也看出孔子为季氏着想的真诚。当然，季氏的从谏如流也是可贵的。季氏与孔子的交往中，史料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季氏对孔子的求教，包括政事、学术和私事处理等。例如，《孔子家语》中载：“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夏，桓子穿井于鄆，得物如土缶”，桓子不知为何物，请教仲尼说穿井“得狗”。仲尼纠正，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闾；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羴羊。”两人谈论问题，亲切而自然，毫不拘束，真是一个学而不厌，一个诲人不倦的形象的生动写照。

从季氏与孔子的交往关系中，可以看出季氏与孔子有着共同的治政理念。即强调统治者率先垂范，强调以德治国，教化为先。纵观中国历史，像季氏这样的“政治世家”是绝无仅有的。季氏的成功，当然有他们的必然性。这除了他们家庭特质的禀赋以外，还在于他们必须真正的忠君、爱民、勤政，并且要把这种传统精神“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他们世代孜孜勤政的精神，推动着鲁国的发展。

《论语》中记载了多则季氏与孔子讨论政治的对话，反映了他们对政见的讨论和一致性。《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直率地回答了季康子的问题，强调了统治者率先垂范，“打铁还要自身硬”的重要性。这和孔子反复强调“自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不盗。”（《论语·颜渊》）真是一针见血，指出统治者自身廉洁对人民、对治国的正面影响的积极作用。当季氏要开杀戒时，请教孔子，曰：“如杀无道，而就有道，何如？孔

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里不仅指出统治者自身行为的垂范作用，而且还把责任直接推给了当权者，并且还涉及到了教化方法问题，那就是要以德治国，怀柔人民，然后才能清除不良风气，形成良好的民风。关于对民实施教化的问题，孔子是十分重视的。《孔子家语》记有一事足以说明。“孔子为大司寇，有父子争讼者，父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讼）。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以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管司法，父子打官司，同关一监内，三个月不判，最后无罪释放。季氏不满孔子了。这段对话，孔子简直是当面指斥季氏为代表的统治者，自己无道，不搞教化，却反过来枉民于法。这简直是在为民喊冤了。好在季氏还算开明，主观愿望是勤政为民的。到底怎样教化人民，《论语·为政》载：“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实际讲出了教化百姓的原则，要真正让人民自觉忠君、敬上、自我规勉，还得要统治者自重，作为榜样。季氏与孔子不但有着共同的理政观念，而且在施政中也配合默契。孔子堕“三都”是一次著名的以“强公室，卑私家”为目标的政治行动。这次行动直接针对的是“三桓”。《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这段记载主要指出堕三都由孔子动议，理由是“三桓”的私邑城墙都超标了，为维护鲁君权威，必须拆毁。《左传·定公十二年》则记述了堕城及遇抵抗的经过。“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鄆，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郈人袭鲁。公与三子（注：“三桓”）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郈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郈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鄆。”堕城拆墙遇阻力，甚至发生了武力对抗。而私邑被毁，私利受损的季氏却全力支持鲁君和孔子的政治行动，而且季氏为防不测，确保堕城成功，还亲率部队保驾护航（《左传·定公十二年》载：“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鄆。”）。这还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据孔颖达疏，因为费邑险固，此前已发生过多家臣叛主事件，为私邑的长治久安，季氏才坚决堕费都，此说似季氏专为自家之利，但季氏毕竟有政治家的胸怀，能与鲁君孔子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并付诸行动，实属难能可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因为季氏和孔子的关系，或许是费邑的地理位置优势，也或许是因为费邑的民风淳厚，孔子对季氏的费邑也是一往情深的。他曾一度想响应季氏家臣公山弗扰之聘，到费邑任职，把费邑作为他恢复西周文明政治的实验基地，实现他“从周”的理想抱负，“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东周”，意为在东方恢复西周之政治。孔子的雄心抱负可谓大矣，惜被学生子路阻止而作罢，未实现他在费邑的作为。

季氏与孔子的交往对话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才观。季氏是十分重视人才、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季氏屡次荐用孔子即是范例。此外，《论语·宪问》载：“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注：外交），祝鮀治宗庙（注：礼乐教化），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这段讨论，孔子强调的是卫灵公虽无道，但他用人得当，主管内政外交、军事的人皆是贤者，因此也不至于速亡。关于重用人才的事，《论语·子路》中孔子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季氏宰仲弓问政时，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里特别强调



職司乘田
孔子嘗爲
氏司職吏而
高蕃息蓋孟
子所謂求田
而牛羊茁壯
長也

的是：政府要正名，端正形象，像政府的样子，上司对人民要宽容，讲究恕道；对人才要推举使用这三项原则。“孝”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季氏当政，受孔子影响，“孝”成了人才的重要标准。《论语·雍也》载：“季氏使闵子骞为鄆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齐鲁以汶水为界，闵子骞不愿受季氏之聘，发誓要逃官跑到齐国去，态度决绝。闵子骞以孝闻名，是难得的人才，季氏爱之，以私邑相托。事实最终是，闵子骞还是做了鄆邑之宰，且教化有方，治绩卓然。季氏善用人才收获了好结果。季氏还为储备人才而处心积虑。《论语·雍也》载：“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欤？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一一介绍，答复季康子，所问的几位各有所长，皆可大用。为了发现人才，季氏甚至亲自去物色求学中好学的人。《论语·先进》载：“季康子问，弟子谁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对话中季氏求贤若渴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然，探讨季氏与孔子的关系，说到根本上，还必须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季氏与孔子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否则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分歧、矛盾，甚至发生斗争。春秋时期，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礼”还未受到严重冲击，尚能勉强维持着包括各诸侯国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而孔子始终是“周礼”的守护者。当季氏一旦僭越“礼”这一底线时，孔子就表现为零容忍。《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竟敢越礼用周天子的舞乐仪仗（注：周天子的舞队行列为八八行列，诸侯国的是四四行列）季氏连诸侯都不是，在孔子看来，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行为，所以怒不可遏。

《雍》是周天子在宗庙祭祀时用来撤除祭品的乐歌，“三桓”都使用了，于是孔子大加挞伐：“三家者以《雍》撤，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论语·八佾》）孔子进行声讨，目的是极力维护周王朝的权威，体现的是统治者的等级理念。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旅”是一种祭祀名称，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境内的山岳。季氏祭泰山，显然是僭越周礼。孔子几乎是气急败

坏，并贬低季氏连林放（孔子弟子）都不如。对于季氏的欺君行为，孔子更是针锋相对，坚决对着干。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昭公因季孙氏和叔孙氏斗鸡事讨伐季平子，失败，反被季氏赶出鲁国，先后流亡到齐、晋等国，最后死在晋地乾侯。季氏迎葬昭公，但把昭公葬于祖林墓道之南，与祖茔隔开以示贬斥。“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孔子家语》）孔子又把昭公移葬进祖林，并批评季氏的非礼，义正辞严，依礼合情。对于季氏的政治野心，孔子更是直击要害，不留情面。《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要用武力吞并弱小邻国颛臾时，孔子即一针见血指出：“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之外而在萧墙之内也。”揭穿了季氏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境及其别有用心。有时，孔子甚至迁怒于规劝不力的季氏家臣，除本篇批评冉有、季路对季氏的规劝不力外，而在《论语·先进》里，竟然因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而大怒，就因冉求作为季氏家臣而为季氏敛财，就不承认冉求为自己的学生，并号召其他弟子进攻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是金刚怒目，嫉恶如仇。对于季氏的腐败行为，孔子是宁可与之决裂，也不妥协。《论语·微子》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爱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氏收受齐国的美女，孔子规劝不听，反抗不了，只好选择离开季氏，离开鲁国。态度决绝，毫不妥协，做了最坚决的斗争。

根据季氏与孔子的对话，可作如是结论：一是他们平等对话，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可见他们之间是一种毫无顾忌的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自由氛围。二是对话中好像全为孔子的说教，季氏对问题未置可否，其实季氏那种谦虚请教的态度本身就很值得肯定。既然敢于触及当时的社会矛盾，社会热点问题，就起码反映出季氏作为当政者想解决问题的愿望、热情。能做到这点就非有忠君、爱民的思想不行，就非有勤政的态度和责任担当意识不行，这正体现了季氏政治家的风范。可见季氏世代为卿，并非偶然。三是联系季氏辅政的业绩，应该就是季氏与孔子探讨的治政理念的落实与成果。可见出他们有共同的理念，并努力付诸了实践。四是季氏的政治地位是高于孔子的，能谦虚地请教孔子，这恰好证明了季氏勤政而不耻下问的谦逊作风，是当政者难得有的品行，很值得借鉴。

四、季氏与费县

费县历史悠久。上古时系少皞氏属地（今曲阜尚有少皞陵）。春秋时为鲁国东畿之重地。康熙《费县志》载：“其星野，古为鲁地……其形胜，西兼颛臾之固，南得武城之险，背龟蒙，带笭、浚，左探沂水，右接洙泗，当齐鲁之交冲，亦江淮之要地。”史料最早记载费县见于《尚书·费誓》。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鲁（今曲阜），周公留朝辅佐武王，其子伯禽代父赴封，为鲁国始君。

公元前1056年，徐国（今徐州一带）之戎和淮浦之夷联兵侵鲁，伯禽率诸侯讨伐，在费地（今费县）誓师。誓辞便为“费誓”。

至鲁桓公时，桓公三子（孟孙、叔孙、季孙）同辅国政。桓公卒后，鲁国内乱。季友因立僖公有功，加之本年又“帅师败莒师于郚”，稳定了鲁国内政外交，因此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赐季友汶阳之田及郚”（注：郚即费之古体字，在今费县毕城一带）。季友始，以季为姓，费地从此成为季氏私邑，季氏八代人六任正卿，200余年，从未离开费邑，一直代代相承袭，苦心经营着费邑，费便成为季氏的发祥之地。研究春秋鲁国季氏，追寻季氏先祖在费遗踪，离不开研究费县。

季氏在费活动大事如下：

1.季友封费。

2.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钱之……”通过私下外交努力,终于保住了汶阳之田。(《左传·成公八年》)

3.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季孙宿(武子)任鲁国正卿伊始,“南遗为费宰(注:季氏家臣),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请城费……故季氏城费。”(《左传·襄公七年》)这是第一次记载季氏或初建或扩建费城之事。

4.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季平子平定家臣南蒯之乱,南蒯出奔齐。

5.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南蒯再次率费人叛,季平子采纳冶欧夫(注:鲁国大夫)的建议,离间并怀柔费人“费人叛南氏。”(《左传·昭公十三年》)季平子再次平息私邑之乱。

6.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南蒯再“据费叛”,鲁司寇老祁用计驱逐南蒯出奔到齐,齐派鲍叔文子送交南蒯于老祁,南蒯之乱彻底平定。(《左传·昭公十四年》)

7.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邴两家斗鸡,引发昭公不满,发兵讨伐季平子,平子请求昭公宽恕:“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注:辞职归于私邑),弗许”;“请以五乘亡(注:离开鲁国),弗许。”结果,季平子走投无路,反手用武力驱逐了昭公,昭公出亡齐、晋,最终卒于晋之乾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8.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未至,丙申卒于房。”平子视察费邑东野,暴卒于今费县方城。(《左传·定公五年》)

9.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桓子葬父季平子之后,视察费县东部,“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家臣费宰子泄出费县城迎接犒劳桓子。(《左传·定公五年》)

10.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氏私邑费宰家臣阳虎于费邑“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后又盟桓子于鲁之“稷门之内”。夺取了季氏权力,代季氏执政鲁国。(《左传·定公五年》)

11.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齐国夏伐鲁,阳虎在费邑策应齐国抵御桓子。(《左传·定公七年》)

12.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阳虎据费,以“去三桓”为名,欲设宴计杀桓子,三桓共御阳虎,阳虎败“入灌、阳关以叛。”(注:一直到定公九年,阳虎失败出亡晋,后为赵氏家臣)(《左传·定公八年》)

13.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左传·定公十二年》载:“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季桓子接受了鲁公、孔子(注:时为鲁国大司寇)和费宰仲由的意见,帅师武力拆除了越礼超标的私邑城墙。是为著名的“强公室、卑私家”的“堕三都”政治事件。

14.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师伐鲁,“季孙之甲七千”,并动员费宰冉有以武城(注:费属地)人三百为已徒卒……及齐师战于郊……齐人遁。季康子动用亲兵和家卒打败齐军。(《左传·哀公十一年》)

15.鲁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72年,战国4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葬。”冉有时为季氏家臣,任费宰。康子使其代已出席葬礼。

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战国8年),季康子卒。

季友至季康子六代正卿,辅佐鲁国十二君,200余年。

16.康子之后,季氏不复见于史料,惟《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鲁悼

公卒，十四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邱。”周考王十四年，为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8年），季康子已卒40年。《竹书纪年》中这个季孙氏虽未见名讳，但足可说明在季康子身后40年里，鲁国仍是季氏执政无疑。

17. 战国时期，费邑自为小国。《孟子》记有一费惠君，《曾子书》有“费君”“费子”之称。刘向《说苑》：“鲁人攻鄆，曾子辞于鄆君”，也有“鄆君”之谓（注：“君”“子”皆为国君之尊称）。《吕览》：“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鲁连子称陆子谓齐湣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曰：邹费郟邳，费国亡于何时？实未可知。要之，春秋后之费国，即为季氏食邑之费无疑耳。”据以上史料，战国时期费国的存在确信无疑。但《吕览》只是指出费国立国在季氏旧邑，但费国之君未必就是季氏。至于费国之君是否为季氏后人，康熙《费县志》认为季康子之后，“季氏不容于鲁，且不甘心臣鲁，遂据费自为国”。费国国君“盖季氏之后”。此说仅是推测，目前尚无史料佐证，只好存疑。

当代费县季氏，人口约有5000人，以北季家疃为中心聚居地，遍布全县几十个村庄。季氏后人，人才辈出，各行各业，多有成就。费县邻县乃至全省全国都有季氏后人。从费县走出去的海外季氏，也多不可计。季氏后人如瓜瓞之绵绵，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着。

季氏费邑遗址和季桓子井，位于今费县城西北十公里的西毕城村、古城、宁国庄村一带。遗址已无春秋旧城，只有东周城和汉代城遗址，东周城应为战国费国城邑。汉代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周城呈圆角长方形，依城西北角又筑有内城，平面近方形，有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宫殿建筑等遗迹，曾出土带有戳记的陶豆、绳纹瓦片等。在夯土建筑的西北方向，有季桓子井遗址，井北有清代石碑两幢，一为清乾隆年间费县知县骆大俊所立，上镌“季桓子井”四字；一为嘉庆年间山东督粮道孙星衍同费县知县郭志青所立，上镌“季桓子得豮羊之井”八字。城东墙内侧已发现大型战国墓葬，木质棺槨保存较好。附近曾出土铜剑、铜戈、铜马衔、铜镞等文物近百件，城东、西部曾多次出土陶瓮棺、汉代画像石等。2001年修建日东高速公路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北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在约300多亩地的范围内清理出东周至两汉时期墓葬1700余座，出土文物5000余件。

春秋季氏六代正卿，葬地皆未见史料记载。但《左传·定公五年》载：季平子“行东野……卒于房（注：今费县方城）”当年，季桓子完成父亲平子葬事后，“行东野及费”似乎是顺路到私邑视察，由此推想，季氏墓地应该离费城不远。据光绪《费县志》载：“在古鄆城西三四里，有古墓三，巍然高峙，相距百余武，西一墓，光绪己丑岁陷，内作宫室状，纵横各三进，砖石铺砌，无碑碣可考。费为季氏封邑，未必不葬此。至战国时费自为国，此或费君墓欤？”“陷墓中出一铜器，似周鎛，墓外有石画像，较东汉画像尤浑古”。此古墓之墓主人是春秋季氏，还是战国费君，无法断定，但据出土文物，此墓也不能排除为春秋季氏地宫。（注：此墓今已不存）

季文子庙，位于费县南百余里之文峰山前（今兰陵县境内），始建于何时已无考。康熙《费县志》有元代王良弼《重修季文子庙记》，或最迟建于宋、唐。文子墓在庙后。旧庙已不存。2012年重建，为省级保护文物。

帝乡雷泽：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郎兴启



泗水县东境与平邑县接壤处，有一片广阔的低洼地带，方圆达二三十里，面积68平方公里。上古时代这里曾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巨大湖泊，周围环绕着草木丛生的沼泽湿地。据当地传说及史籍记载，这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古雷泽的遗址。雷泽南岸立有明代石碑，题曰“雷泽湖”。此地东近蒙山，西临泗水，北拱泰岱，南望凫峰，山环水抱，风水宜人，地灵人杰，向称“帝里”，上古时代先后走出了三皇之首的先帝伏羲和五帝之一的虞舜，成为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之地。虽然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淘洗，叠积了厚重的历史尘埃，二帝在此生长活动的遗迹仍然处处可见。《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潜夫论·五德志》等典籍亦同此说。华胥所居之华胥国，就在雷泽西北十几公里处的古华渚，历久讹变为黄沟。当地又有华胥山，讹为黄粟山，俗称黄山寨。又有华村，即汉代所置泰山郡华县的旧治。其地自古建有伏羲庙、女娲庙。华渚、雷

泽近在咫尺，此处即为华胥履大迹生伏羲的雷泽，是言之有据的。

伏羲氏族久居于此，以族名地，许多与伏羲有关的地名保留至今。雷泽，又名服泽、伏泽，服伏同音，皆因伏羲而起。清泗人王子襄《泗志钩沉》云：“泗水东七十里伏山，亦作服、负、浮、包，亦名浮丘……所居有泽，因名莱泽，音特作雷泽”。伏山在雷泽北，俗名关山，雷泽南有萑首山，即陪首山；又名伏首、负首、服首，俗名普救山。山麓起伏而北，至雷泽西滨，一支东北与伏山相接；一支转折西南行为负尾山，即陪尾山，山西麓有泉林，泗水之源也。凡上所列伏、服、负、浮、萑、包、陪、普诸字，皆由伏字一音之转。以伏字命名的山名、泽名、地名如此多而集中绝非偶然，实则为伏羲一族发迹并久居此地的力证。

伏羲风姓，雷泽一带古为风、莱二族共居之地，因此有不少以风字命名的地名保留至今。雷泽东南方有扶犁山，亦名抛犁山，又有浮来山，亦名包来山。其扶犁、抛犁、浮来、包来等名称皆为风莱二字之音转，古代扶、抛、浮、包皆读重唇，与风字同音。

伏羲以下几千年，其风姓后裔曾长期居住繁衍于雷泽及泗水上游地区。《伏羲庙残碑》有文：“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据《春秋左氏传》记载，至春秋时期，伏羲的风姓后裔任、宿、须句、颛臾四国，仍在奉太昊伏羲之祀。已故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认为，颛顼即颛臾，“伏羲奉祀四国，颛臾在费县西北，与泗水东南相接，即伏山、雷泽一带，地为伏羲旧壤，故以本地之族裔奉其明祀，立国为颛臾。”位于雷泽湖东十几公里处的平邑县城东颛臾村，即为古颛臾国旧址，如今遗迹尚存。可见雷泽就在古颛臾邦域之内，确为伏羲发迹之故壤。泗水城西原有风后岭，岭上有风后庙。风后即伏羲族风姓后裔成为国君者，居于县西之岭，因称风后岭。族人立庙奉祀风后，故有风后庙。据清末王子襄《泗志钩沉》所述，似当时风后岭附近尚有封姓（即风姓）族人，直至元末之乱，庙毁废封，居民迁尽，风后才改为丰后，后又改为酆后。

雷泽一带不仅存在伏羲族人生活繁衍的众多古迹，而且散布着舜帝发迹的大量



遗迹。雷泽南有历山，即舜所耕之处。《孟子》言：“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就在历山之南的诸冯村，清末改名为凤凰庄。一说即今平邑县铜石镇浚河两岸的南诸冯、北诸冯、诸冯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载：“舜母握登，于姚墟生舜，因姓姚氏，姚墟又作陶墟”。酈道元《水经注》载：“泗水出卞县故城东南，陶墟西北……杜预曰：鲁国卞县东南有桃墟。世谓之陶墟，舜所陶处也，井曰舜井”。可见，舜的出生地陶墟（姚墟）就是位于卞县故城东南部的雷泽历山地区，诸冯村恰好位于陶墟之内。

从舜帝先祖的地望分析，王氏《泗志钩沉》说：“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郟”。勾望即舜的曾祖父。颛臾、姑幕、郟三地皆距雷泽不远，位于姚墟附近。由此可知，舜生于雷泽附近的陶墟（姚墟）是可信的。再从舜早期活动的地域看，《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寿丘即今曲阜，负夏亦称负瑕即今兖州。可见舜早年耕、稼、渔、陶、作什器、就时等活动，就来往于距雷泽几十公里之内的兖州以东一线。由于舜德高望重，且以孝闻，深得民心，影响日远，后被尧帝发现，“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在雷泽历山周围，遗留有众多有关舜的历史遗迹。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山之东有祠，有石刻，金大安元年重修也”。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庙记碑》文：“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又有明碑记：“泗邑东去封内七十里，有历山，山之左有民舍千余家，自古为集。村依山名焉，为先帝大舜耕、陶、渔之处也”。《史记》载：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文革时期于历山村东舜帝庙西沟的出土文物及沟两侧所裸露的古建筑痕迹中，可以辨认得出，历山确是古代一座规模较大的城邑。2010年，山东省考古队对历山遗址进行了部分考古发掘，面积达2.1万平方米，发掘出沟1条，墓葬3座，建筑基址3处，出土有陶罐、瓷盘、瓷碗、铜簪、铁锄等物品。历山村东有舜帝庙村（今属平邑），该村西北有舜帝庙一座，占地十余亩，殿宇遗址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0米。庙宇庄严肃穆，气势恢弘，庙内古碑众多，松柏参天，奉祀舜帝及娥皇、女英。前有舜桥、舜井，可惜毁于“文革”期间。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金代大安元年（1209年）重修庙碑，文曰：“创建久远不可考”。《费邑古迹考》亦言“立庙于斯，其由来远矣”。雷泽湖西缘亦有舜井一口，俗称驸马井，所在村庄就叫驸马井村。因舜娶尧二女为尧女婿，井名由此而得。我于去年曾前往探访，见井已废弃，井旁石碑倒地，井沿石壁因磨损日久留下深深的沟槽，井旁有新立的泗水县文物保护石碑。倒地石碑上有乾隆四十五年的“重修石井碑记”，碑文记载井为驸马所建，并记述了舜的姚姓后裔主持修井的事迹：“我驸马井旧有石井一座，创造不知始自何代，因名驸马井，是知驸马为之于前者也。有本里姚君讳之兰者，曾君讳尚文者，不忍坐视。慨然有志重修……于是有驸马为之于前而美斯，后有姚君为之于后而盛斯传美，是为记”。

王献唐先生生前曾亲临雷泽历山一带实地考察，采取“以地名证之，氏族证之，乐歌证之，母族证之，庙祀证之，族裔证之，官司证之，凡数十余事”，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姓氏学等多学科的深入综合研究后得出结论：“舜为泗水之人，已成定讞。《世纪》诸书冀州之说，可不攻自破矣。以舜为泗人，而泗有历山、雷泽诸处，知史籍所载重华耕渔之地，皆确然不诬。更知所载伏羲居处之雷泽诸地，亦确然不诬。当羲皇之前，已有各地之名，伏羲生长于

此，居住于彼，族人相传，史籍各就生长之地分别纪之。其后帝舜亦生长于此，而耕渔于彼，史籍亦各就生长耕渔之地分别纪之。二帝同为泗水之人”。至于各地的多处雷泽历山，有的有山无泽，有的有泽无山，有的虽有山有泽但地在东夷之外，有的虽处东夷地区但地势低洼，与二帝所处洪水泛滥时代情势不合。凡此与二帝发迹之史实皆不相符，足见二帝发迹之处只能是泗水雷泽历山，其余都是二帝走出雷泽，自东徂西，进入中原之后，族迁名随之地。

雷泽地区作为伏羲虞舜二帝发迹之地，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山泽秀美，风景奇异，自古就是绝好的游览胜地。明代更将“雷泽秋声”列为著名的“泗地十景”之一。

雷泽湖地下为石灰岩层和砂岩层地质结构，湖底满布石灰岩巨石。经过千万年的湖水溶蚀，一些湖底巨石出现巨大缝隙和洞穴，湖水便漏入地下，与地下水汇合后透过石灰岩溶隙及砂岩断层，向西流至陪尾山麓涌出。湖水夏季涨满，秋冬漏涸，因此雷泽又名漏泽湖，当地居民俗称漏斗湖。

对于漏泽奇观，古籍志书多有记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陶“墟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激渟，三丈如减。泽西际阜，俗谓之妨亭山，盖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复有妨亭之名矣。阜侧有三石穴，广圆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陂竭泽矣。左右民居，识其将漏，预以木为曲洑，约障穴口，鱼鳖暴鳞，不可胜载矣。自此连冈通阜，西北四十许里，冈之西际，便得泗水之源也。”元代于钦《齐乘》记：龟山“西南十余里有漏泽，泽有五穴，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将漏之时先有声，居人扈穴取鱼，随种麦，比水至，麦已收矣。”《黄志·漏泽记》载：“泽中之穴，怪石嶙峋，外险中虚，容数十百人。”王子襄《泗志钩沉》则云：“湖心突起攒石，立秋后水泄石窞，其声如雷，雷泽之雷义起于此。”光绪《泗水县志》载：“漏泽湖，亦名雷泽湖，在城东五十里。中有石窞，伏秋多雨，众水灌入，渟溜十数里。秋后石窞自开，湖水下沉，其响若雷。”明代于慎行在《游泗上泉林记》写道：“问水所从来，盖出雷泽云。泽方数十里，春夏水拍空，秋冬则涸。其涸也如雷鸣，一夕而竭，水溢陪尾山下，为泗诸泉。常有泽中器物浮出，斯已神矣。”各种记载虽穴数不一，方圆不同，情景有别，但从中亦可略见其概貌。

自古以来雷泽湖水就是泉林泉群的主要地下水源，堪称泗源之源，圣源之源。它不仅孕育了伏羲、虞舜二帝，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且哺育了孔孟颜曾众多先贤，成为儒家文化的摇篮。因此古来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揽胜，观光吟咏，留下许多优美诗篇。唐代校书郎李潜写有《漏泽赋》。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送乔仝寄贺君》中有“不惊渤海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的诗句。明代文学家于慎行《泉林歌》赞之曰：“雷泽万顷波，澎湃如万马。陪尾镇之不得溢，翻为灵渎出其下。”明代泗水知县张祚在《泗地十景咏·雷泽秋声》诗中吟咏道：“春水盈盈秋复竭，雷泽隐隐振虚籥。须知太极相循理，只在阴阳消长中。”明代泗水知县尤应鲁在《游泉林得泗上民歌》赞叹曰：“岩壑奔腾赴雷泽，漾漾湖光百谷王。岗陵叠障无从泄，一声秋响裂地藏。暗穿万窍疏石窞，喷薄泉林涌流洑。莫言此说是虚诞，趵突古传有弃糠。”

透过史籍的种种记述以及文人墨客的吟咏诗篇，可以遥想当年漏泽的壮美景观。入夏湖水涨满，碧波万顷，渌水激渟，鱼虾游弋，四周草木丛生，蝉鸣蛙唱，一派江南风光。一声秋响，石窞自开，水穿地窍，涌入泉林，声若雷鸣，惊心动魄，数夕漏涸，倾陂竭泽，鱼鳖暴鳞，不可胜载，居民捕鱼，其喜洋洋。这样的情景不知延续了多少世代，及至清末，“石窞泥土淤塞不复开”（光绪《泗水县

志》），湖漏不再。清杨佑廷《雷泽湖考》说：当时“石穴既不复存，湖水秋后只潜消，雨水少则涸出者多，雨水多则涸出者少。冬前春初尚可种麦，夏秋可渔，但不若旧传之奇异耳。”我村就位于雷泽湖旁，村里的土地有一大半在湖里。记得建国初，每到盛夏初秋，湖里还是一片汪洋，但秋季还能种植一季抗涝的高粱，每到收高粱季节，村民们便争相去湖水里抓鲤鱼。到了1958年前后，泗水县县长带领群众在湖西开挖“回龙套沟”，将湖水引入西面的洙水河道，再汇入泗河，名为“雷泗新河”。后来又在湖东南治理了跃鱼沟，增加泄洪，开渠放水。由此沧桑巨变，千古雷泽风光不再，沧浪湖水变为沃野良田。历史上名播遐迩的“雷泽秋声”胜景也被新的“泗水十景”所取代。但时至今日，湖区周围凡70岁以上的老人多数对当年漏泽湖情景仍有记忆。出于好奇，前年我曾实地探访过雷泽湖的漏眼，在灰泉村和南近台村位于湖区的田地里找到了两处漏眼的大致位置，因表面已被田地覆盖，无法看到真容。印象较深的是平邑仲村镇南近台村的一位老者马全来，非常热心地带我去察看了一处漏眼的具体位置。该漏眼位于南近台村南湖十三亩地的东南角。现在此处地面平整，遍植杨树，已经看不到漏眼的任何痕迹了。据他记忆，早年间该村村民马景武曾经进入该漏眼探视。漏眼的上部空间较大，约有一间屋大小，向下有一个较窄的深洞，深不可测，用五六根担担绳子（每条三四米长）连接起来也没能够打探到底部。

另据程琨考证，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泗水县分别修建了四座中型水库：华村水库、龙湾套水库、贺庄水库和青界水库。这几座水库的建成，对当地的农业和水产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放到文化的角度来说，水库的建成却是对人类古文化宝藏的一次毁灭。在四座水库中，最大的两座为贺庄水库和华村水库。这两座水库相距不远，库区所占的范围包括了上古时代的两处历史文化古迹——华胥渚和古雷泽。随着水库的建成使用，大批的人文历史遗迹便永远沉没在了水底。

捕野兔

王宗富

1960年夏天，新沭河两岸的雨连下了40多天。雨水大，平野成了泽国，庄稼长不起来，各种各样的草却蓬蓬勃勃，一派生机。秋天，遍野荒草，有的地方齐腰深，有的竟淹没了人的头顶。新沭河两岸的南辰、长沙头、东窑、小埠子、东山后、西山后、老古墩（当时属山东省郯城县，现属江苏省东海县）西尧、新龙岗、涝枝、谢家岭、大港头、朱家庄（当时属山东省郯城县，现属山东省临沭县）等几十个村子，只有岭头上长了几片猴子毛似的稀稀落落的庄稼。

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使人们陷于严重的困境之中，不得不四下寻找生存的出路。

老一辈的人都会记得，那年月，庄稼瞎了，草茂盛了，野兔也出奇地多了起来，有的竟大白天到人们的菜园里，到村子里觅食，见了人也不跑。它们无拘无束地在荒野中出没，荒野成了它们的自由王国。

一种完小麦、大麦，公社里便根据郯城县委、县政府的意见，紧锣密鼓地部署下一步的任务，要求各村结合实际，千方百计，开展生产自救。有的生产队提议捕野兔卖钱，然后到外地买回地瓜干、白菜、萝卜，分给群众好填肚子。公社里大力支持，说今年野兔这么多，就在湖野里，为什么不捕，况且又不用出远门。谁知这一下子就点开了各村思路，不少生产队都先后捕起了野兔。观堂公社里还把机关干部分到各村去，下村帮助救灾。

那时无论城乡，生活都极为困难。秋兔很肥，一只野兔拿到集市上能卖100多元钱，有不少城里人积攒两个月的工资，往往仅够买一只野兔的。而加工后的野兔肉冻，更是抢手货，20多元钱1斤，天不过晌就卖没了。

逮野兔，那可全是男劳力的事，因为那是强体力的活。一清早，几十口人便扛着兔网，踏着白霜，走进田野，在一大片荒草没膝的野地的一头，或在一条杂树、杂草丛生的大沟（汛期有水，其它季节干涸）的沟头，或在芦苇、柳树交错而生的河滩地的一侧，或在一大片树林的一旁，把兔网一张接一张地支好。结兔网的绳子全是用麻搓的，均匀而结实。网高约1.5米，长约10—15米，几张网连接起来，就有100多米长。网与网之间，没有空隙，网网相连的两根起支撑作用的棍子高约2米左右，紧靠在一起，牢牢插入地下。网不能扯得太紧，网的下端要接地，隔不远压一块石头，要形成一个兜肚，兔子进网后，才可把

它们兜住。

网支好后，人们便会从网的两端绕到这片地或这道沟或这个树林的另一头，有的离网有几百米，远的有一二里路。此时人们便会折返身，相互打一个号子，然后手持趁手的短棍，一起吆喝起来，并用棍子拨动草丛或树丛，把兔子往网前面赶。兔子也很机灵，它们受到惊吓，便会往前跑上一段，然后停下来，竖起耳朵听听周围的动静。人们需均匀地散开，要把这片地方纳入撵兔可控的范围。人们一边往前走，一边有节奏地发喊，同时用棍子敲击树木，或地面、或地上的石块，或使劲跺脚，以便弄出动静来。

快到网前时，一般都是大约离网有50多米左右，人们便要放缓速度了，然后由领头的人发一声信号，在两边头上的两个人此时便会分别飞也似地朝网的两端跑去，以便截住到了网前而不想进网，想拐一个弯，从网两端溜之大吉的兔子，而其它的人此时便会争先恐后地高声呐喊，一起拼力往前跑。在这一段地面上兔子比较密集，它们在人们的追赶下，往往会接二连三地往网里闯。人们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喊，兔子惊恐之极，拼命向前逃窜……此时相当紧张，有的人腰带被自己下劲呼喊撑断了，有的人鞋子跑掉了，有的人脚被碰破了，全然不顾，仍一个劲地往前冲。因为有的兔子虽然被网兜住了，但仍有逃走的可能，需及时抓住它们；有的兔子相当狡猾，会在网前停下来，欲往两侧跑；有的兔子经过了几遍霜，有相当反捕的经验，它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撞网，它们四处张望，寻找生机；有的兔子会寻找空隙，从网底下用前爪扯开一个出口，破网而出……所以，这一段距离，这一段时间，是关键时刻，是速度的赛跑，是力量的赛跑，是智谋的较量。有的生产队一天能逮到二三十只，多的五六十只。

那时是极为困难的时期，参加捕兔子的人员晚上有特殊照顾，即生产队在牛棚里支起大锅，找几名妇女，烧一大锅白菜辣汤给他们喝。当天晚上，除去准备到县城卖的活兔子外，死兔皆被剥皮清膛清洗后，投入几口大锅里，放上作料，用干柴慢慢煮，煮熟后拆肉兑汤，自然冷却，成为一盆盆兔子肉冻，第二天挑到周围的集市上去卖。

深秋和冬天捕的野兔，皮经了霜质地好，当地供销社收购，而活兔和冰兔肉又好卖，真是一举两得。记得八九十里路之外的郯城县城，江苏赣榆县城、海州，六七十里路之外的东海县城以及夏庄、蛟龙一带的人们，都经常夜里骑着自行车来沭河两岸购买兔肉。

捕野兔，生活困难时期的一项非常之举，到春节前基本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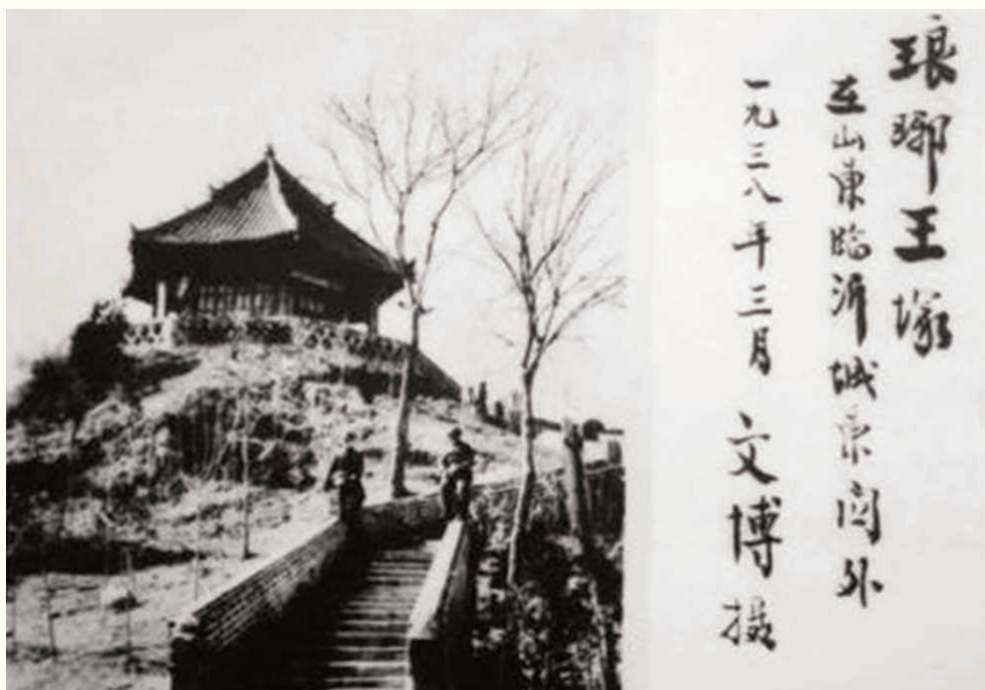




记忆中的老建筑

琅邪王冢公园

本 编



琅邪冢位于临沂城原东关琅邪巷，系东汉时琅邪王刘京的墓葬地，为临沂名胜古迹之一。琅邪王刘京是东汉光武皇帝的爱子，他的封地被称为琅邪国，国都设在莒，就是现在的莒县。据史书记载，刘京在莒城生活了18年，晚年他上书皇帝，愿以琅邪国的五县，换取东海郡的开阳、临沂两县，并将都城从莒城迁至开阳；开阳就是就是现在的临沂城。公元80年，琅邪国由莒地迁都开阳，传六世共141年。琅邪王刘京在迁都一年后去世。

经过1000多年历史的变迁，琅邪冢在东关郊外已成荒丘。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时，由临沂驻军六十六旅旅长李占标牵头，临沂士绅名流捐资，加高加固琅邪冢，又在其上面建了“琅邪亭”，并在其周围广栽花草树木，开辟为公园。临沂第一次解放后，山东大学在原朝阳寺第一小学和城外美国人开办



的经文中学旧址（原临沂卫生学校所在地）开学。学校曾经在琅邪冢公园的树林里搭棚上课。

大约在1950年时，一场大风刮倒了冢上的亭子，而琅邪冢也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了。

唐宋第一将门 琅邪符令奇家族浅析

符东淮



中国历来有将门传统，然观唐宋，唐之将门宋而无继，宋之将门唐而不显，惟有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一脉相传，垂誉史册，故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堪称唐宋第一将门。

一

研究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已有珠玉在前，惟有系统串联，方能完整呈现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全貌。

目前，唐宋将门研究多以点带面进行个案分析，缺乏通盘考察，付之阙如的最大原因恐是难以找出跨度如此之大的将门，截止目前只有琅邪符令奇将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千百年来，我们从史册和传说演义中知道的唐宋将门，全部为分代甚

至分朝的将门。为朝所崇如唐之李氏（李晟、李愬），宋之上党李氏（李处耘、李继隆、李继和、昭亮、惟贤）、曹彬（曹璨、曹玮、曹琮、曹修、曹诗、曹湜、曹曠），以及蒙城高琼和山西种氏等；为野所乐道的将门如唐之薛氏（薛仁贵、薛楚玉、薛嵩、薛讷、薛平、薛从），宋之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等，在知名度上远超为朝所崇将门，但挤掉水分，则另当别论。

在目前所知的研究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众多专著中，以港台学者成就最高，国内学者恐是囿于传统演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故而止步不前。香港何冠环在2007年发表的《北宋外戚将门陈州宛丘符氏考论》应属于断代研究，把陈州符氏分为三个阶段，即太祖朝、太宗朝、真宗朝及北宋末；台湾苏建伦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晚唐至北宋陈州符氏将门研究》，增加了晚唐符存审及五代时期符存审儿子的事迹论述，较何氏之著，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成为陈州符氏从崛起壮大到鼎盛的集大成之作，其结论“陈州符氏是惟一一个自晚唐兴起、历五代不衰、存续至北宋末的武将之家，也是五代、宋初最著名的外戚将门”。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临沂望族研究会和世界符氏文化研究会在2012年编纂出版的《琅邪符氏文化志》中对符姓有整体研究。由本人2014年撰稿的《中唐五代两宋符氏将门研究》，首次通盘展现唐宋之际400多年符氏将门整体面貌。此外符氏文化研究会整理的《符家将》也可作为参考。

观诸学者所著，常把符存家族归于陈州宛丘来命名，笔者认为可以这么说，但这只是籍里，符姓在宋之前郡望一直是琅邪（今临沂），陈州符氏虽未自称“琅邪符氏”，但也没有否定“琅邪符氏”（因宋代历五季之乱普遍不多提郡望），况其后嗣直到今天一直是称“琅邪符氏”，所以，唐宋符氏将门是应称“琅邪符氏将门”。

从时间上看，国内外真正深入细致研究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仅七年时间，但符氏文化研究会及本人，为唐宋符氏将门研究准备的时间却达十年之久，方能集腋成裘。

二

“丞尝共享唐庙朝，金石尤存宋诰辞”，这是琅邪郡承堂符氏宗祠楹联。从此联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支符氏是以琅邪符氏将门为荣，其他支亦皆然。

纵观符氏历史，唐宋时期是符氏2000年历程的巅峰，这一时期符氏家族挤进中央权力中枢，前后莫能企及。一脉相承的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又恰是唐宋将门中历时最久的。世家历乱世衰落，而符氏因军功而再致贵，延续不断，也正是符氏将门有别其他将门世家最大的标志。

研究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须遵循学术研究的严谨作风，以史为据，不妄虚拟，又勇于推创，方能有所突破。目前所掌握关于符氏将门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研究以正史文献为主，辅以墓志铭、族谱相互整合印证。对于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没有关联的“符秦后裔”人事不妄引入；而可能为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的人事，在没有确切证明的情况下，仅简表其名事（如唐大将符凤、后梁将相符道昭、后唐平卢节度使符习、赵州刺史符令谦、后晋成德军节度使符蒙、后周左藏库使符令光等。）而不将其归入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而同是琅邪符氏（如湖南支符氏，其中五代宋初溆王、黔中节度使符彦通，有史家以其为符秦后裔，是有公允的套话），分支历东汉派衍过久，非符令奇支，也不录入。

本篇研究乃粗略梳理唐宋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的大致脉络，至于详细解析，则于《中唐五代两宋符氏将门研究》中论述。



符琳



符彦卿

唐宋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的发端从以身殉国忠义起家的符令奇开始算起，以符令奇为第一世。而后其子孙相继，后接符存军功著业，开启陈州符氏将门，一门三后勋戚益高。

符令奇祖上世居琅邪，为琅邪六大名门望族之一，收入《氏族志》，后又入《大唐氏族志》。

符令奇祖上三代均为武将，曾祖符敦敏，赠节度使，迁沂州府即前琅邪地近阙里，配李氏。大父符龙谥谨直，妣州刺史配褚氏。烈考符晖谥勇义，游击将军，颍王府左撰事典军，赠青（常）州刺史，配斐氏。因符令奇是第一个载入正史有传的武将人物，故以符令奇命名唐宋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而且后世符氏族谱，也多尊符令奇为第一世。

符令奇秉承武将家风，仰慕英杰，于安史之乱之际，投奔名将薛仁贵家族后裔薛嵩，并与其结为亲家。

符令奇（704—782）沂州临沂人。起初任卢龙军裨将，适逢幽州叛乱，领着儿子符璘（733—798）投奔昭义，昭义节度使薛嵩署任他昭义节度军副使。薛嵩死后，田承嗣夺去了薛嵩的地盘，推荐符令奇担任重要的职务。

在唐大历十年，符令奇在昭义军任“军副”；建中三年（782）魏博节度“为右职”。历银青光禄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

魏博节度田悦抗拒朝廷命令，马燧在洹水打败了田悦。符令奇告知其子符璘：“安、叛乱，为人不齿，悦叛唐，覆灭无日。怎能为了旦夕而苟且生存，将来被捆送到京城，而宗族全被灭掉呢？你若能归顺朝廷，做唐朝的忠臣，我也能名扬后世。”符璘哭着说：“田悦，为人残忍，眼前的灾祸太可怕了。”符令奇回答说：“如今官军从四面合围，我们已是砧板上的肉了。你现在走了，我死而不朽；你不走，我也是一死。何必要同时死在此地呢？”符璘低头哭泣不能回答。

当初，田悦和李纳在濮阳相会，于是向李纳请求援兵，李纳分出一部分部众跟随田悦走了。到这时，李纳的军队要回齐地，田悦派符璘率三百骑兵护送。符璘和

父亲咬臂出血而别，建中三年正月符璘出发后，于是和符琳、符瑶率领部众归顺马燧。

田悦知道此事后发怒，把符令奇叫来严厉谴责他。符令奇骂道：“你忘恩负义背叛皇上，旦夕之间就会死掉。我教导儿子归顺朝廷，杀死我有什么可后悔的？你我都是死，但比你要好得多！”田悦发怒，将其处死。符令奇临刑时，面色不变，时年79岁，田悦杀了他的全家。马燧署任符璘为军副，朝廷下诏拜授符璘为特进，封义阳郡王。当他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呼号气绝哭得吐血，马燧上表辩白符令奇的冤屈，德宗下令加授符璘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并赐给晋阳宅第一区、祁田五十顷，符令奇以身殉国，追赠符令奇为户部尚书、左仆射、琅邪郡公。

符令奇之子符琳授检校太子宾客、琅邪郡公，符瑶授忻州别驾、琅邪县男，皆号开府，分领禁职，赏与公同忠劳也。

从以上封爵上可以看到，琅邪符令奇与天水符秦迥然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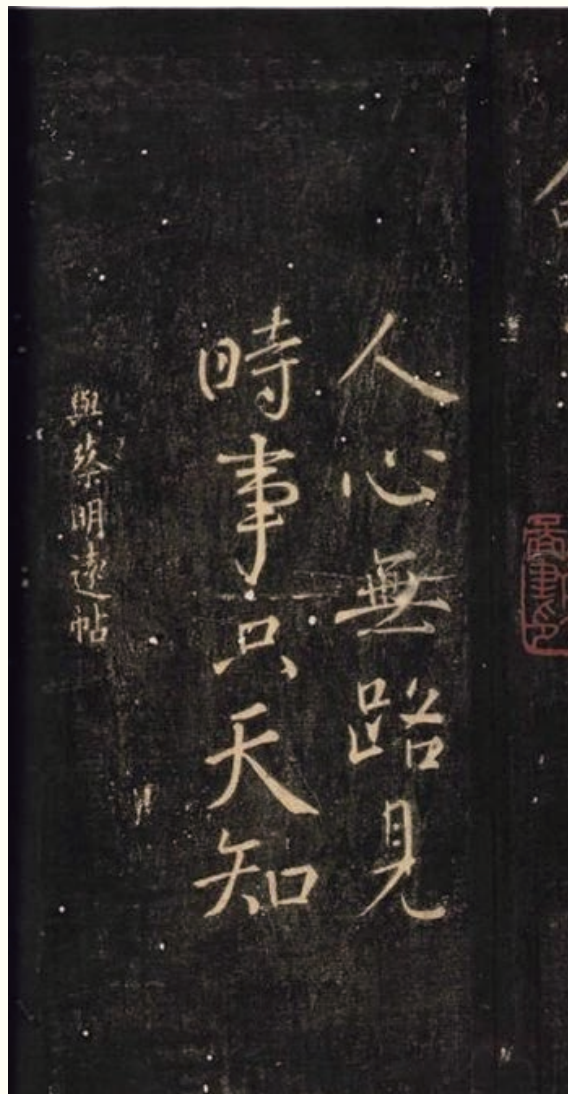
符璘归顺朝廷后，不断立下战功。据《符璘碑》载：贞元元年，李怀光寇蒲坂反叛，朝廷下诏命令马燧以河东之师去讨伐。符璘和5000士兵先行渡过黄河，和西面的部队会合，势居要，同收长春宫，降徐庭光。后跟随马燧入朝，任辅国大将军，皇帝赏赐给他靖恭里宅第一区、蓝田田四十顷。二年，西蕃寇边，攻逼盐夏。公（阙一字）偏师击虜，解围而还。三年，从燧入觐，擢拜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复赐靖恭里第一所，蓝田田十（阙一字）顷。贞元初，德宗之幸梁还也。惩神策军兵（阙一字）将轻，缓急非有益，乃蒐卒谋帅，以公充选，时谓得人。禁暴戒严，上心倚赖。（阙一字）年丁邓国太夫人忧，起复本职。

从符令奇以身殉国开始，其后人多在疆场效力。从此开启了唐宋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之先端，符氏将门第二代符璘屡立战功，又居皇帝身边十几年，成为符氏将门第一位封王者，父子二人并载《唐史》，符令奇另二子皆号开府，分领禁职，其后符令奇孙子亦领节钺，这时的琅邪符令奇将门家族已经显现。

宋拓颜真卿《奉命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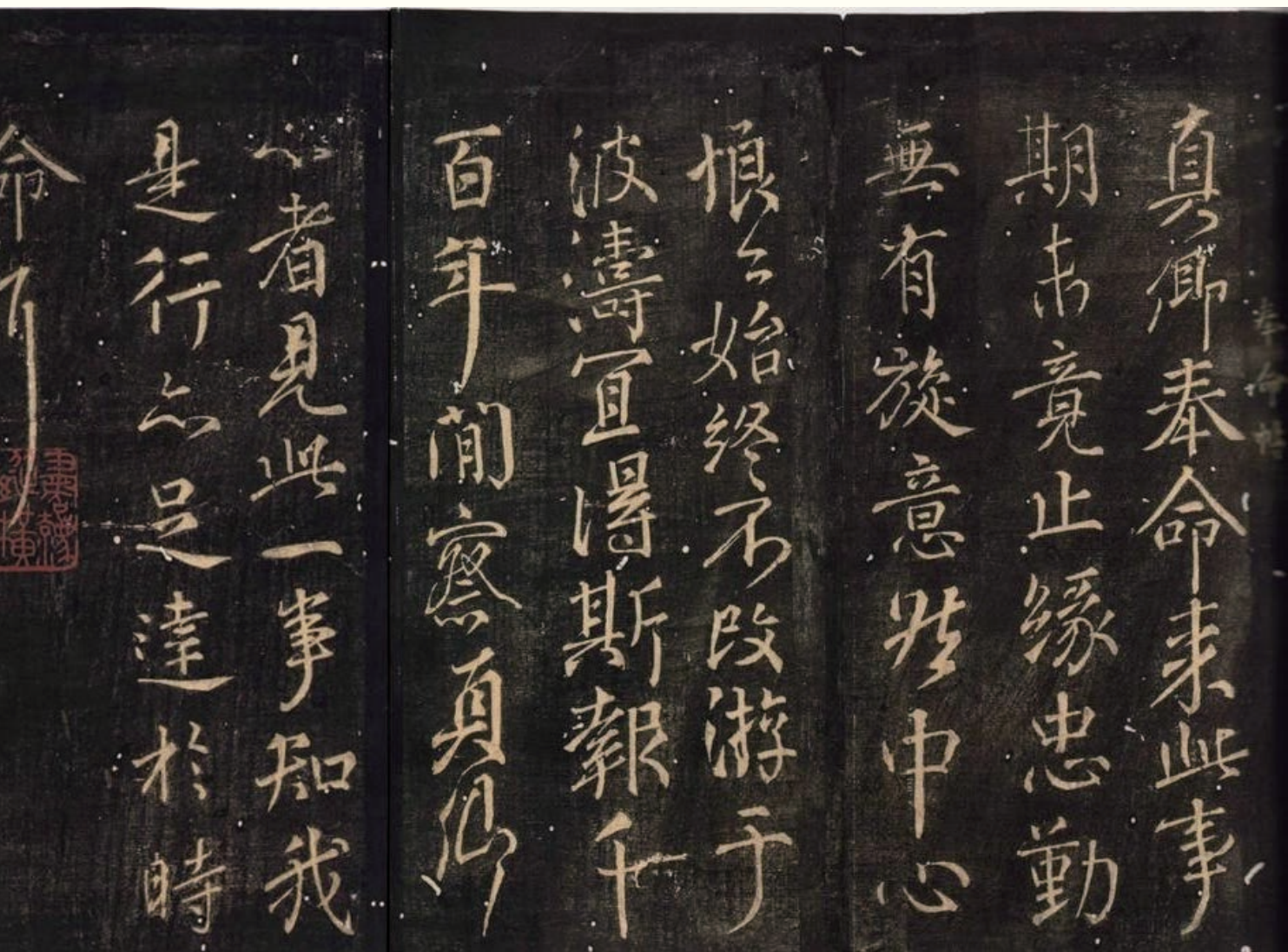
沉入史海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小名羨门子，别号应方，生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颜师古五世从孙、颜杲卿从弟，唐代名臣、杰出书法家。开元二十二年（734），颜真卿登进士第，曾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率义军对抗叛军。唐肃宗即位后，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河北招讨使。至凤翔，授宪部尚书，后迁御史大夫。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善诗文，著作甚富，有《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均佚。宋人辑有《颜鲁公集》。



《奉命帖》书于建中四年（783）。行书，刻帖，信札。35.6×16.5厘米。凡11行，计69字。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本。是帖无书写年月。据帖所说“真卿奉命来此，事期未竟，止缘忠勤，无有旋意。然中心悵悵，始终不改，游于波涛，宜得斯报。千百年间，察真卿心者，见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达于时命耳。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明赵《石墨鐫华》认为：“观其词意，乃使李希烈时也。”建中四年（783）正月，颜真卿以“太子太师淮西宣慰使”的身份，前往许州宣慰李希烈。此帖应在此年，时年75岁。所以又名《奉使蔡州书》。颜真卿知天命无违，则其奉使许州，计不旋踵，已无归意，烈烈忠节，临难慷慨，不能不中心，悲恨交加。正如司马光《新唐书传赞》所说：“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颜真卿的真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他的行草书，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开一生面。颜真卿的行书道劲郁勃，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故而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宋拓颜真卿《奉命帖》 35.6cm×16.5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临沂汽车站的变迁

本 编



上世纪50年代的临沂汽车站旧址

1949年5月，临沂汽车站建立，地址设在临沂城南门里路西老当铺院内。

1951年，汽车站第一次搬家，搬至于现在临沂展览馆附近，青龙河南面一带。当时车站面积很小，车辆不多，只能算是发车点。

1952年，车站再次搬家，搬到现在的解放路东段大银杏树附近。

此后的1954年、1960年、1963年近10年内，汽车站又陆续在临沂城转了三个地方。

1963年3月，汽车站搬至现在的通达路与解放路交会处，此时汽车站成为临沂城的焦点。1984年5月，临沂汽车站建起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综合性车站大楼，此后22年的时间里，这座车站大楼承载了临沂大部分的客运量。

1991年，临沂汽车站更名为临沂汽车客运总站。2006年10月22日，临沂汽车客运总站再次搬迁。新址位于双岭路中段，西至琅琊王路，为临沂商城商贸物流中心区域。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由售票大厅、候车

大厅、检票大厅（三个发车岛）、虹拱组成，设有发车位120个，设计日发班次4000个。现有经营线路299条，其中跨省线路107条，省内线路114条，区内线路78条，覆盖全国17个省、3个直辖市和1个自治区；日发总班次2325班。

临沂汽车客运总站现为国家一级客运站，是亚洲设计与建设规模最大的客运站之一，被交通部确定为“国家示范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临沂汽车站



上世纪80年代的临沂汽车站



上世纪80年代的临沂汽车站站台



上世纪80年代的临沂汽车站候车室



现代化的临沂汽车站新站

姓氏百家漫谈——孙姓 (二)

赵丹峰

东汉及三国时期，吴郡孙氏因出了数位英雄豪杰而名扬天下。孙坚系兵圣孙武后裔，东汉末一代名将。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坚少为吴郡司马，黄巾起义爆发后，孙坚追随右中郎将朱儁赴中原镇压义军，中平四年（公元187年），累功任长沙太守，封乌程侯。后董卓专权，关东州郡讨伐董卓，孙坚亦起兵响应，挥师中原，成为袁术的部下。孙坚抵南阳时，所部已有数万劲旅。他和袁术合兵屯驻鲁阳（今河南鲁山），袁术上表推荐他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故时人以“孙破虏”称之。孙坚在梁县以西的阳人城击败董卓，斩杀其部将华雄，为卓所深惧，告诫其部将对孙坚应多加提防。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在洛阳城外大败董卓，攻克洛阳后，得汉传国玉玺，并修复了被董卓破坏的皇陵。是年，又奉袁术命攻荆州刘表。刘表受挫后闭城不战，派部将黄祖乘夜出城调集人马。黄祖带兵归来，又被孙坚击败，于初平三年逃至岷山之中，孙坚率兵追击，被黄祖部下从林中发射暗箭射杀，年仅37岁。

孙策系孙坚长子、孙权之兄。在父亲孙坚进军中原时，他与家人徙居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其间广结江淮知名人士，出身于舒县望族的周瑜，即在此时与孙策结识，并成莫逆之交。孙坚死后，年仅19岁的孙策于公元194年辞母从军，投奔袁术，袁术认为是故人之子，遂将原孙坚旧部让其统领。因不是袁术的心腹，故并不受袁术重用。此时，割据群雄正倾其全力在中原逐鹿，而江南地区则成为没有强大割据势力的空虚地带。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坚依朱治建议，向袁术提出：要帮助丹阳太守吴景（孙策之舅父）平定江东，袁术允之，并向朝廷请封孙策为折冲校尉。孙策所带其父旧部虽仅有千余人，但却是久经战阵的精兵猛将，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周瑜闻之，遂率军士并大量粮秣来历阳（今安徽和县）迎接孙策，使其实力大增。率军攻克横江、当利后，即挥师渡江南下。孙坚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治军严明。军队所到之处，“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由于深得民心，过江不久，队伍便迅速发展到两万余人。孙策身先士卒，率军攻占扬州刺史刘繇所据的曲阿（今江苏丹阳），并广贴告示：“凡刘繇部属有来降者，一概既往不咎。愿意从军者，视同自己部属。不愿从军者，悉听自便。”此告示一发，人心



归顺，数十天内，四方响应者云集，一时兵强马壮，声震江东，旌旗所指，势如破竹。数年间，孙策便占据了扬州的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等六郡，使江东地区基本归于一统，被时人誉为“小霸王”。孙策依周瑜所率士族为骨干，结合以张昭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江东六郡土地上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孙氏政权，为日后东吴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以受其控制的汉献帝的名义，诏令孙策任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四月，26岁的孙策在外出打猎时为仇家射中面颊。临终时，嘱其弟孙权继承其业。

孙策猝亡后，年方19岁的孙权（字仲谋）成为江东之主。他谨遵兄长遗嘱，依靠周瑜、张昭等重臣的倾心辅佐，“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又揽纳鲁肃、诸葛瑾等为其谋士，继续肃平残余的割据势力，使江东地区局势更趋稳定，人心归一。充分展示孙权杰出政治家风采的是发生于其执政8年后的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得荆州后，率20万大军（号称80万）沿江而下，并遣书威胁孙权。当孙权将信给部属们传看后，众人多震惊失色，长史张昭等众臣均建议孙权投降曹操，使东吴免遭灭顶之灾。此时，只有周瑜、鲁肃等人力主抗曹。时孙权虽只有26岁，但作为经历风雨的杰出政治家，他临危不乱，经过权衡，遂采纳周瑜、鲁肃的正确主张，决定联合刘备，共抗曹操。为示其决心，在听完主战派和主降派的辩论之后，他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正是有了如此坚定的决心与气魄，孙、刘联手的大方略得以实施，在周瑜、诸葛亮的精心运筹指挥下，孙、刘联军才取得了以5万之众大胜曹操20万大军于赤壁的辉煌胜利，从此形成了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难怪宋代大词人辛弃疾在面对浩浩长江时，会发出“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的怀古兴叹，这既是对历史的追思，更是对孙权这位一代豪杰的诗化定评。

谈起赤壁之战，人们对诸葛亮于战前“草船借箭”的故事可谓耳熟能详。其实，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为塑造诸葛亮这一智慧超人的形象，采用移花接木的

手法所做的艺术性杜撰。历史上，“草船借箭”的主人翁是孙权，而非诸葛亮。

“借箭”的时间亦不是赤壁之战，而是5年之后的濡须之战。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率军攻东吴，孙权与其遭遇于濡须坞（今安徽巢湖市运漕河上），初次交战，孙权即以水军攻曹军，曹操受挫，损数千人，于是坚守不出。吴军多次挑战未果，孙权便趁水面有薄雾，便自乘轻舟，从濡须口逼近曹军营寨，以探曹操军情。孙权所乘船只行驶有五六里路程，便往返奏乐。生性多疑的曹操见吴军整肃威武，恐怕有诈，不敢贸然出战，遂令兵士射箭攻击。曹军箭簇如雨，吴船受箭一侧挂满箭后发生倾斜，孙权命士兵调转船头，让另一侧继续受箭，待船体恢复平衡后，孙权便命士兵挂起风帆，载着挂满曹操“赐给”的箭簇，欢喜而返。曹操得知实情后，后悔不已。曹操自度东吴君智将勇，军威凛然，知道此次已难取胜，不禁脱口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遂撤兵北还。

孙权统治江东53年，所辖区域由江南地区渐扩至今福建、广东、广西以及越南的北、中部地区，除在政治上采取联蜀抗魏，以固北防的国策外，在发展经济、开拓外贸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如孙权下令推行屯田制，普遍使用牛耕，促进了东吴农业的发展；同时兴修水利，发展内河水运。自赤乌三年（公元240年）至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先后下令凿修运渎、青溪和破冈渎，将京城建业（今南京）一带的水系联接贯通，又凿丹徒至云阳水道，入通吴、会，此水道即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这些工程，对便利水运、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还发展开拓海上运输与对外贸易。孙权命造大船，一为作战使用，二为便于开展海上运输贸易。当时，吴国的船队北至辽东，东抵夷洲（今台湾），南达南海诸国（即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夷洲在西汉时属会稽郡。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在其正式称帝建国后的第二年，即派卫温、诸葛直乘大船率甲士万余人，前往考察了解情况。东吴船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出发，经辛苦航行，在今台南市和嘉义一带登陆。经考察，发现此地虽四面环海，但土地肥沃，适于农业和渔业的发展，极具开发价值。后，又将数千当地土著迁往大陆。史家认为，这是大陆与台湾开展直航交通的最早起始。孙权还十分重视纺织、冶铸等手工业的发展。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孙权命“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时武昌冶铸业之发达，可见一斑。勿庸讳言，其在位期间，特别是后期，亦存在过于专权、用法严酷、赋役繁苛等施政之弊。纵观孙权一生，他是以自己的辉煌业绩，作为与曹操、刘备比肩的杰出政治家被载入史册的。

魏晋时期，孙氏族中还出了一批文化名人。孙炎系三国魏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他作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郑玄的高足弟子，因学识渊博，被时人尊为“东州大儒”。孙炎在经学研究方面建树甚巨：撰《周易春秋例》，并相继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和《国语》作注。另撰《尔雅音义》，首用反切注音，获学界高度赞许与效仿。自此始，反切注音便盛行于国中。

孙楚和孙绰是晋代玄言诗的代表性作家，均系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以诗宣扬玄学，是玄言诗的一大显著特色。生活在西晋的孙楚工诗文辞赋，史称其“才藻卓绝，爽迈不群”。所作《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系晋代较早的玄言诗。其辞赋颇佳，《鹰赋》系其代表作，其中“深目娥眉，状似愁胡”两句颇为传神，为人称道。日后杜甫在《画鹰》诗中吟哦的“侧目似愁胡”句，即由此借化而来。孙楚少年时曾想隐居山林，曾对好友王济说：“我欲漱石、枕流。”王济不解，遂问道：“水流怎么可以枕，石头又怎能漱口呢？”孙楚笑答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厉其齿。”于是，“枕流漱石”的故事便广为流传。孙绰晚于孙楚近百年，生活于江南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官至廷尉卿，袭封长乐侯，与许询同

为东晋玄言诗的领军人物。所作《答许询》诗以四言句阐发道家哲理，成为此期玄言诗的代表作。孙绰善辞赋，所作《游天台山赋》系东晋名赋之一。其碑诔笔力厚重，文情兼具，为当世所推崇。

东晋末年，在江南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震惊朝野的农民大起义，这支起义军的领袖便是孙恩。孙恩，字灵秀，琅邪（治今山东临沂）人。孙恩所在的家族琅邪孙氏亦系该郡士族之一，但地位远不如琅邪王氏显赫。其家族世奉五斗米教（即天师道）。叔父孙泰，因以天师道结众聚徒先被流放广州、继而为东晋官府所杀。孙恩怀恨流亡海岛（今舟山群岛），继续传道，策划举事。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执政，三吴诸郡封建剥削甚苛，民众怨声载道。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司马元显征调已免除奴隶身份成为佃客的广大农民当兵，引起群情激愤，处长江下游的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治今江苏苏州）、吴兴（治今浙江湖州）等江南八郡纷起反抗。孙恩乘机登高，振臂一呼，即有数万人响应。起义军先克上虞，继破会稽，所到之处，不仅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同时亦获得了部分不满朝廷弊政的地主的同情，孙恩自称征东将军，旬日之间即聚众达数十万。他们烧毁官府，捕捉长吏，吴中八郡在数日之内即有多位地方大员被起义军击杀，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及凝之诸子、谢安的两个儿子谢邈和谢冲等，亦于此时被杀。面对严峻形势，东晋朝廷遂派谢安之子卫将军谢琰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劲旅前往镇压。刘牢之征召刘裕为参军事，与起义军展开激战，经多次交锋，孙恩皆失利，不得已率20余万起义军将士退回海岛。翌年五月，孙恩再次率军登陆，重克余姚、上虞，直指临海，并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大败官军，阵斩谢琰及其两子。后因朝廷增兵，又退居海岛。隆安五年，起义军第三次登陆，从水路至京口（今江苏镇江），欲取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朝廷大惊，遂派重兵防守京师。起义军攻克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又从海上北至郁州（在今江苏连云港东，又名田横岛。清代因海岸扩张，始与大陆相连），为时任下邳太守的刘裕所败，便南撤入海。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第四次率部登陆，进攻临海，战败后愤然投海而死。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率起义军继续战斗，于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兵败自杀，此次为期12年的起义遂告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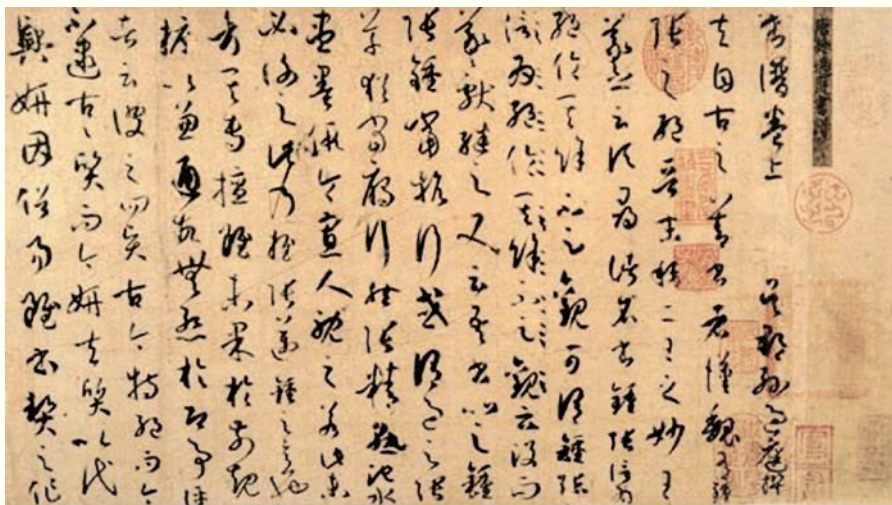
唐宋时期，孙氏一族在文化和医学领域出了若干位颇有建树的名家。孙樵，字可之，玄宗大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上柱国。系唐代著名散文家，位居清人所誉“唐宋十大家”之列，是晚唐坚持古文运动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为文风格奇崛，对时政世情多有讥讽。作为古文运动不祧之祖、大文豪韩愈的三传子弟，孙樵继承韩愈反佛依儒的精神旗帜，对唐宣宗李忱登基后一改武宗禁佛的政策，而大肆兴佛、增加国家和人民负担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在《复佛寺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兴佛害民之弊：“若群髡（即僧徒）者，所饱必稻粱，所衣必锦绣，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十七万夫，以十家给一髡，是编民百七十万困于群髡矣！”他的这些政论性篇什，以实喻理，笔锋犀利，受到时人与后世的高度赞评。所作《读开元杂报》一文，则被视为中国最早新闻报道的记载。另外，还撰有史学著作《孙氏西斋录》（今仅存序略），有《孙可之集》传世。

孙过庭和孙位享誉于书坛画苑。孙过庭系武则天年间著名书法家和书学理论家。他于正楷、行书、草书皆工，尤以草书成就最大。唐张怀瓘评其草书宪章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工于用笔。孙过庭虽怀才不遇，中年即亡，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书论名作和草书墨宝《书谱》。这份撰书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作品，以简洁的语言阐述了正草二体书法之要义，见解深刻精辟，不仅在

理论上对当时与后世书坛具有指导借鉴意义，同时亦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书法艺术精品。宋代米芾为此评价道：“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认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谱》计3500字，属我国古代保存完好的一幅草书巨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孙位系唐末重要画家，号会稽山人。公元881年初，黄巢破长安后，他避难入蜀，居于成都。擅长画人物、松石、墨竹和佛道宗教画，尤以画龙水著称。其画风雄健奔放，不以着色为工。曾在蜀中应天寺、昭觉寺、福海寺等寺院画过诸多壁画，皆笔简而形备，备受好评。传世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竹林七贤》，画中人物神态清高孤傲，旷达超俗，形象地揭示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不愧为传统中国人物画的代表性杰作。

自成体系的中国医学，自战国发展到唐代，已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被亚洲各国誉为“东医”。在系统总结前人医学经验，以辩证施治的正确思维，将这一中华瑰宝进一步发扬光大、创新提高者，正是得益于孙氏族中的一位杏林巨擘，他就是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世称孙真人。因幼时多病，遂立志为医，青年时即以医名闻誉乡里。他医德高尚，对民众疾苦感同身受。他身跨隋唐两代，先后拒绝过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所授予的官职，却从未拒绝过病人的求助。他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作为其为医处事的座右铭。笔者在尚未入学时，即听外祖母（其娘家姓孙）讲过一则有关孙思邈使人起死回生的故事：一次孙思邈外出时，偶遇一行出殡的队伍。他驻足片刻，即上前挡住抬棺众人，高声叫道：“人尚未亡，怎可忍心埋葬？”送殡家人忙道：“人早已亡故，先生休得乱讲，碍吾正事！”孙思邈便手指棺下道：“人若已亡，其血定会凝固。然此棺下正有血滴出，怎可轻谓此人已亡？”众人细观棺下，确有一道血丝由棺内溢出滴落地上，遂卸杠开棺请其察视。只见一妇人面色蜡黄，小腹颇凸，下身正往外溢渗鲜血。女子丈夫便哭告道：“吾与妻婚后十年未育儿女，此次怀孕已逾一载，不期昨日因难产而亡！”孙思邈先试其鼻息，又号其脉象，便说“有救”，遂取银针三根，依次扎其人中、中腕与中极处，捻转数下，该女子便睁开双目。其家人见状纷纷叩头，以谢救命之恩。孙思邈又开药剂一付，女子回家服药后，果然母子俱安。此事一经传开，孙思邈便被人们视为神仙。此故事有多种“版本”，更有人移花接木，说是系临沂一旧时名医所为。故事虽带有演绎色彩，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孙思邈悬壶济世之高尚医德和妙手回春之精湛医术由衷颂扬的心曲。

孙思邈从医时间长达80余年，其间，他躬身于诊疗实践，潜心于医学研究，为发扬光大中华医学，他本着“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的原则，从有益于救



孙过庭《书谱》



治苍生，为民众备急之用的目的，在系统总结自上古至唐代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与临床体会，撰著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医学名著。《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对中华医学所做的一大历史性建树，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所有医家皆悉本于《神农本草》，秉持“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的成规与理念，致使很多由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治病验方，不被医家所采用，客观上阻碍了祖国医学的发展与创新。而孙思邈本着富于进取的科学态度与创新精神，对诸多民间验方进行了认真研究与实践，开首创中医“复方”之先河，正如清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派，有不可磨灭之处。”正因《千金方》具有集大成性和实用性，在被广大医家与民众采纳使用后，取得了极佳的医疗效果，以致出现了自该书问世流播后“而古圣制之法不传”的局面。

作为医学大师，孙思邈在中医学领域的造诣广博而精深。他不仅精于内科，还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同时对养生、食疗、针灸、疾病预防和炼丹等均有独到的见解与研究，在药理学知识方面亦是一位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专家。如在伤寒学方面，他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创立脏病、腑病分类法，具有新的系统性；在妇幼保健方面，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妇产、小儿建立专科创造了条件；在针灸方面，他绘制了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和“阿是”穴及等身寸法，促进了针灸医疗的应用与发展；在临床上，对附骨疽、消渴、麻风、夜盲、脚气及甲状腺肿的描述与治疗均有独到创见，还倡行葱管导尿术、食管异物剔除术等。其中他对脚气病的治疗和预防，比欧洲人早了约1000年；在养生学方面，他有独到的创建，并且身体力行。他活了101岁（还有120岁、141岁甚至168岁之说），注重日常养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总结倡导的发常梳、目常运、齿常叩、漱玉津、耳常鼓、腰常摆、腹常揉、摄谷道（即提肛）、膝常扭、脚常搓等健身要诀，时至今日，仍为国人所奉行，近年来更有发扬光大之趋势。孙思邈以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非凡建树与光辉人格，赢得了历代人民的崇敬与景仰，他逝世后，被尊为“药王”，不少地方为其建庙修祠，永世祭祀。

马建波：字典里没有“不”的好人

王泓钧



2016年11月16日13时40分，马建波在市第三次农业普查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7岁。追忆起马建波生前的事迹，同事、亲友们无不悲伤、动容。在临沂市统计局和他共事十几年、二十多年的老同事们都说：“老马虽然姓马，但他更像一头老黄牛，一头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老黄牛！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请了一天的假，下午却又来上班了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协调解决市蒙山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云蒙办事处普查两区地图绘制以及清查摸底与蒙阴县的对接问题；拟定下周工作计划；召开市农普办有关人员会议，安排部署下周业务工作。

2016年11月12日（星期六）：筹备全市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再动员会议。

2016年11月13日（星期日），自上午9：00始，由于联系不上货运司机，一直在市工业大道与育才路交会附近的林丰托运站蹲守到晚上10：30，终于接收、清点了省农普办通过货运公司发来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员手册》。

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下发工作通知，调度各县区农业普查清查摸底“两员”培训、普查区和普查小区图绘制、入户摸底进展及计划完成情况；审核、上报省农普办全市普查区、普查小区地址码；向县区分发《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员手册》，至晚7：00全部分发完毕。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调度、整理、下发市扶贫办、市住建局等18个市直部

门、单位的涉农单位名录和2015年度主要指标数据；撰写全省农业普查宣传工作会议典型发言材料；审核、评估全市农作物秋冬播面积报表数据。

以上是马建波去世前五天的工作日志。2016年11月16日上午，马建波主持召开全市第三次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培训会议，期间他感觉身体不适，大家劝他回家休息，他仍坚持开完会议。会后他回家去取前晚加班留置家中、下午急需安排布置的农普材料，没有顾上休息，紧接着赶回办公室，下午1点40分左右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当晚10时30分去世。

马建波生前系临沂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副队长（主持农村统计科工作），从事统计工作26年来，他视统计事业为生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自1990年12月到市统计局工作以来，马建波先后任职市城调队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副队长（主持农村统计科工作），2015年12月任临沂市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综合组组长。2016年马建波主笔撰写的《关于“一点两区”精准扶贫情况的调研报告》先后被市委办公室《领导参阅》2016年第10期、市政府研究室《决策参考》第46期全文刊发。

马建波担任我市三农普办常务副主任、综合组组长，是我市农普工作的顶梁柱，特别是2016年8月29日农业普查综合试点以来，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扑在普查工作上，每天坚持在工作一线，既研究筹划工作思路和部署安排工作开展，又直接负责运送物资、撰写材料、电话调度等具体工作，近三个月没有正常调休。

“他去世的三个月前，曾跟我说太累了，向我请了一天假，我说行，就准一天。没想到第二天中午，还没到下午上班时，马建波又到办公室来上班了。马建波就是这样，他始终对工作兢兢业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把干好工作作为第一要务，真的视统计事业为生命。”市农普办主任聂怀善说。

大家第二天早上来加班，才知他通宵干完了

“马建波学历不高，他自学的电脑编程，却担当起单位四个科室的程序员。”老同事孙宝庆说，“马建波做了也不说，工作总是默默地干，任劳任怨，从不张扬。”有一次，上级需要录入上报100个抽查户的具体统计报表和12个县区的报表汇



总，头一天下的任务，要求第二天报完，当时负责科室的孙宝庆说好了第二天调用别科室的几个人突击加班的，“第二天早上7点多来的时候，我看到建波在，就问他怎么来这么早，他说没走，表报完了。我这时还不相信，因为找来帮忙的人都来了！他一晚上竟然自己把几百页的账页一个数一个数地全录入完了，还汇总了12个县区的报表！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是红的！”

说起英年早逝的马建波，老同事臧宝伦热泪盈眶，他说：“老马的嘴边总挂着微笑，谁让他帮忙他总说好，问他明天有事吗，他总说‘我没事，有事你说’。对同事的帮助偶尔一次有求必应不新鲜，长期坚持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和马建波认识这么多年，他做了多少好事已经记不清了。”其中一件事，让臧宝伦记忆犹新。2012年冬天，他们局做年报，农业科的一位女同事业务不太熟，请来马建波帮忙，当晚，就在马建波帮忙做年报数据的时候，同事的孩子突然发高烧，她赶紧送孩子去医院，打吊瓶，一晚上忙碌下来，竟然把马建波在办公室帮忙的事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她才想起来，忙赶到单位，发现办公室里还亮着灯，烟灰缸里一堆烟把，表已报完。那时办公室晚上12点就停暖气了，也不知道马建波这一晚上怎么坐得住的。

白发苍苍的杨增奎也是马建波的老同事，马建波22岁的时候他们就认识。马建波平时爱帮助别人，但从不提自己家的事，他出事后，同事甚至连他家人的电话都不知道。他八旬的老母亲拄着拐棍来到急救室儿子的病床前，看到儿子无意识地躺在床上，说：“你这个小东西，我让你天天忙呀，忙得不着家，这回不忙了吧，我非得打你几棍子不可！”其实，他的母亲已经悲痛得举不起拐棍了。

他从未为自己活过，从不会对别人说“不”

在妻子黄颖眼里，马建波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还是一个只替别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的老实人。“他为所有人活着，从未为自己活过！他太善良、太老实、太能挨，在他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字，别人让他编个程序、修个计算机、连个网络、代个值班，他从不拒绝，而且总是尽心尽力去帮忙、去完成。”

有了微信后，黄颖发现马建波几乎一个好友也没有，但他有四个工作群，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不管白天还是凌晨几点，群里一有问题他都会积极回复。妻子怕影响他休息曾解散过他的几个微信工作群，但黄颖没想到他还有个QQ工作群！

结婚不久，马建波就对黄颖说家里必须有台电脑，那时他们家还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攒了好长时间工资，才花了2400元买了一堆电脑零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电脑。后来黄颖才知道，马建波花这么多钱买电脑，就是为了把在办公室干不完的工作带回家干！即使他晚上很晚回来，大多时候还要在书房电脑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脑里全是他存放的统计数据。他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但自己会组装电脑，他的电脑知识全是为了工作一点一点自学的。“为了工作，有时候他两天两夜呆在单位加班不回家。”

马建波去世前的几个月，因为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女儿马颖聪说话。“早上一睁眼，爸爸就上班走了，晚上很晚爸爸才回来，中午又不见人！”马建波的女儿马颖聪说，“从小爸爸就很疼我，我说想要什么他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帮我实现，现在想想，有爸爸真好！父亲去世太突然了，他身体一直挺棒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认为这只是一个噩梦，梦醒了爸爸还在，然后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你开玩笑的’！爸爸突然走了，我和妈妈一直很怀念他。”

杏林之外科俊杰

——记李明君

刘凤才

《黄帝内经》曰：“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在祖国医学的“五脏六腑”中，肾与膀胱就占两席，足见其地位之重，作用之大；对其疾患，则以“内治”为主。而在现代医学中，肾与膀胱属于泌尿系统两个最重要的器官，对其疾病则对症施治，除内科治疗外，相当一部分常见、多发病，需要实行外科手术治疗。在中医医院充满祖国医学氛围的杏林之地，能以现代泌尿外科之成就“异军突起”，让人刮目相看，实属不易，也必定有扛鼎之才。李明君就是这样一位杏林中的“外科俊杰”。

李明君现任临沂市中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临沂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将其誉为“杏林中的外科



俊杰”，不是言过其实。其一，他本来学的是中医，却从开始临床工作起就从事外科专业，而且比许多学外科、干外科的“更像外科”。其二，他在外科特别是在小儿、泌尿外科上，创造了市中医医院的若干“第一”和“唯一”，有些技术一直走在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处于领先水平。第三，他在外科治疗一些疾病的成功率上，远远超过了业内平均水平，而在复发率与死亡率上，则大大低于业内平均水平。所有这些，也“铁定”了他就是一位外科俊杰。

“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只要热心

李明君1966年出生，是沂水县富官庄乡人，虽然叫富官庄，但是当时村里相当穷。

父亲是儿时的李明君最佩服、最崇敬的偶像。老人家虽然只上过两年小学，但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脑子聪明，心灵手巧，多能多艺，能文能武，老百姓说这叫有“才”。二是心地仁慈，忠厚本分，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老百姓说这叫有“德”。父亲还“能官能民”，最早当过公社主管会计，3次当村党支部书记。父亲第一次担任村支书时，正赶上1958年“大跃进”，当时大刮浮夸风，各村上报的粮食产量，如同极度膨胀的气球，全凭干部一张嘴，能吹多大吹多大，能吹多高算多高。李明君的父亲虽然脑子聪明，但不会弄虚作假。如果按上级要求的指标上报产量，即使村里一粒粮食都不留，全部上缴了公粮都远远不够，难道让乡亲们喝西北风？于是，他“不识时务”，在留下了社员们的口粮后才上报了产量。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被一个大跃进“积极分子”告发。结果父亲被免掉了支部书记的“乌纱帽”。父亲倒情愿不当这个被迫吹牛的官儿，去公社医院当了一名医生，他早年曾跟着一位老先生学过中医，《黄帝内经》什么的都背得滚瓜烂熟，也给许多人看过病，都说他医术高医德好，当医生是撂下的活儿。后来不到一年时间，上级给父亲平了反，他又当上了村支部书记。父亲第二次被罢官，则是在“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父亲被当作“走资派”被打倒。后来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时间不长，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吹掉了“乌纱帽”。这次，父亲没再去当医生，而是拿起了锯斧刨斧等家什，干起了木匠，他自小还学过木匠活，打的家具比县里木器厂的“制造出品”还好。正当父亲一心要靠自己的手艺勤劳致富“奔小康”时，又被乡镇党委“强行命令”当了村书记，要求他不但要“自己先富起来，还要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其实那时还都没富起来。1986年，父亲从支部书记位置上退下来，自己种了六七亩责任田，打的粮食种的菜，自己家吃不了，但从来不到集市上卖钱，而是无私地奉献给村里的贫困户或者亲朋，谁困难谁来拿，白送。

在李明君身上，完全继承了父亲的“DNA”。

李明君姊妹4个，他最小。但他从小就不是备受溺爱、娇惯任性的“老小”，而是个乖巧省事、从不淘气、又十分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听父母说，从他很小起，大人去地里干活了，哥哥姐姐去上学了，就把他一个小娃娃关在家里，留下饭和水，让他“生活自理、随时安排”，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常常是一关一整天，他从来没闹出什么乱子让大人担心。当父母忙完了外面的劳作，提心吊胆、急急匆匆地赶回家时，只见李明君正一个人玩耍得津津有味，要么弄些棍棒棒地插个小物件，要么和些泥巴弄个小玩艺儿。稍大点了，父亲做木匠活时，他就用父亲的家什自己做支小手枪，也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子弹壳，在后面钻个眼儿，装上爆竹药，“嘭”地一下，就能打响。

李明君记忆真好，连小学时的“精彩故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村里很贫困，好不容易拿出几间屋当了小学校，但就是一个“大合堂、大满贯”教室，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挤在一个教室中上课。课桌是几块土坯擦起来的泥巴台子。老师也是一人独掌教鞭，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据说老师本身连高小都没上完，反正他常常把“红彤彤”读成“红丹丹”，把“恬不知耻”念成“舌不知耻”，把“茁壮成长”教成“出壮成长”等。老师不懂得汉语拼音，但为了显示他会，还把“睡觉”念成了“睡决”。当然，孩子们都对老师充满了崇拜之情，以为他满腹经纶、不容置疑，就认真地跟着老师大声地念：“睡决！”

到了中学时代，老师们就坚决不让同学们“出壮成长”和“睡决”了。老师都有了真本

事，李明君学习很刻苦，从管理区联中一下考上了沂水一中，读到高中毕业。那时，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化学脑袋”“理科天才”，理化功课名列前茅。他确实有理科的天赋，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而且特别善于学用结合，特别热衷于动手实践。学了一些物理基本知识，他就买来些电容电阻电感等小零件和电表烙铁焊锡膏等工具，照着书本上线路图，三鼓捣两摆弄，竟然就能组装成一台小小的“明君牌”晶体管收音机，让同学们羡慕不已。

至于学医，则是父亲对他的要求与厚望。父亲说：“学医好，一是对老百姓对社会有用，二是自己能凭本事挣口饭吃。”李明君乖乖地听从了父亲，高考时报了山东中医学院，被录取到中医系中医专业。

农村出来的孩子，学习普遍特别用功，何况李明君本身就天资聪颖。他不仅把中医理论学得全面扎实，对有关西医的公共基础课，他也丝毫不放，学得深入透彻。他不但学习成绩优异，心地还特别宽厚淳朴，热情温暖，乐于助人，不辞辛苦。卫生值日、扫地擦桌、义务劳动、整理校园等，他都走在前面，埋头苦干，出力流汗，从不偷懒磨滑。8个同学住一个宿舍，每天提壶打水的事，他都包在自己身上，常常是两手各提着几把暖瓶，从热水房到宿舍，累得气喘吁吁。时间一久，同学们都知道他原来还是个“物理小天才”，哪个同学电热壶坏了，收音机不响了，就求上门来，请他帮助修理修理，他也乐此不疲。他并无意去争当“雷锋”叔叔或者刻意表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大家问他图什么，他十分自然而朴实地回答：“反正一把壶是提，两把壶也是提，只要能提动，还能累到哪里去，力气是练出来的，哪有省出来的！”

学习用功、成绩突出，品行优良、待人热情，李明君很快赢得了老师的信赖和同学们的喜欢。上大学的第二年，班里竞选班长。很多人想当这个同学中的“老大”，踊跃“参选”者众。李明君本来只想当个“好同学”，压根没想当这个班长，结果大家一致推举了他，而且一直当到毕业。其实这个“同学老大”，完全就是个苦差使。除了学习上得倍加努力、作出表率外，班里的脏活累活体力活儿，都得甘于奉献，必须承担。特别是一到台堂课结束，同学们都一哄而散玩耍去者，他与另一个班长，就成了擦黑板、扫地板的“专业户”。班长不好当，“老大”很辛苦，他仍然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那年代，农村出来的学生，家庭生活大多还很贫困。李明君也是如此，为了缴学费和生活费，直到毕业前一年，他还欠着人家2000多元借款，成了他的一个巨大压力。没想到这时竟然给他提供了一个“挣钱还贷”的好机会。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纷纷照毕业照和留影照。去照相馆吧，得花一些钱。同学中有个家庭条件好点的，有一架135mm的老相机，自己也号称会照相，但是照完一个胶卷，他竟然直接把胶片从盒子里拽了出来去冲洗，结果全部曝光报废，惹得同学们又是好笑又是遗憾。李明君灵机一动：学照相！《黄帝内经》都啃下来了，照个相有什么难的！他立即去书店买了本《摄影技术ABC》，认真学习钻研了两天，连冲洗技术都学会了。他借来同学的相机，先试拍试冲了几次，比专业相馆的一点不差。于是，他发一个“同学周知”：本人开设照相点一处，保证质量，随照快取，只收成本，欢迎光临！当时照相馆冲洗一张二寸黑白照片要收费三角，而且还要等几天才能取，而他只收一角五，五折，大优惠呀，而且第二天即可取照。于是，同学们纷纷找上门来，李明君“生意红火”，不可开交，白天照相，晚上冲洗，最多时一晚上竟然冲洗几千张照片。毕业期间，他共给同学们照相、冲洗7天，除去买胶片钱，竟然赚了2000多元，一下还清了借款；同学们少花了钱快取了照片，双方皆大欢喜。师生们都由衷地夸奖：“这个李明君，简直就是个奇才，还没当上医师，转眼之间先成了照相师！”

司马光有句名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无论在哪里，师生们都对李明君有个评价：他既有才，也有德，是个品学兼备的好学生、好后生。李明君却认为：哪有生下来就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什么都好，既有才又有德的人，但是有一条，无论你干什么事，都要对这件事热心；无论你是谁，都要对老百姓热心，有了这个热心，你就有了既能成才也能修德的根基与力量。

那个年代，国家对大中专生还实行统招统分，毕业生的去向与工作单位分配，是按成绩

与品行从上而下排列的。因为政治上优秀，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优异，1990年7月，李明君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了沂蒙山区最高医疗机构之一的临沂地区中医医院。

别人会的，我也一定能会——只要用心

李明君有才气，更有志气；有热情，也更有着自己的个性。从少年时代，他身上就有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头。他心中时常想着一句话：“只要用心，别人会的，我也一定能学会，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肯定能做到！”这句话，成了他几十年来激励自己成事立业的励志铭。

几年大学生涯，李明君十分热衷于中医，他觉得祖国医学不愧中华国宝、世界奇葩，可谓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当他身怀数年苦读、潜心钻研的学问来到中医医院，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上来就遇到了“学非专业”的课题，他被分配到大外科。地区中医医院建立时，当时即定位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而当时的大外科尤其缺少人才，院里只得从新来的毕业生中挑选中西学业兼优的全面人才，充实到大外科。李明君即在此列。虽然在校时主要学习的祖国医学，但是他的西医基础理论包括外科学，同样学习得很扎实，成绩很优异。他相信只要用心，自己照样能适应，照样能干好。

大外科当时下设颅脑、泌尿、胸科、普外4个科。开始，他跟着指导医生“转科”门诊临床，叫去哪里去哪里，叫干什么干什么。这对他广泛接触各科业务，全面丰富临床经验，普遍掌握外科技术，倒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深厚基础，使他成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多面手。

中医医院成立时，没有设置小儿外科。这对一个市级医院，无疑是一个空白。1995年，院里成立了小儿外科，但是又无专业医生。院领导比来选去，最后选中了李明君，委派他去省立医院专门进修小儿外科。经过一年进修，他又成了小儿外科的专业医生。小儿外科承担的是14岁以下儿童的全外科手术，而当时医院小儿外科，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专业大夫。

李明君“走马上任”不久，就立即面临着一次全新的考验。科里接收的第一例病人，是一名新生儿肛门闭锁患儿。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发育畸形疾病，孩子生下来时只有四五斤重，就像一颗又嫩又弱的小草，稍微一碰就要折断似的。而李明君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疾病，进修时也没学习这方面治疗手术。不仅他从未接触过，他的指导医生李献忠也没做过这种手术。大家一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然而，孩子的生命却等不得，由于患儿自身又无其他排便瘘管，如不及时治疗，随时都面临死亡威胁。就在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励志铭：“只要用心，别人会的，我也一定能会！”就是面前无人会，不是还有更会的嘛——找教科书！他立即向指导医生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急用先学。李献忠医生是位敢于担当的老师，立即表示同意：“小李，你大胆地做，我全力支持你！”于是，李明君立即找到教书上的有关内容，认真仔细地学习研究了一番，然后毅然上了手术台。结果，除了耗时稍长了些，手术很顺利很成功。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坚定了李明君的信心。从此，他成功创造了本院小儿外科史上的若干次“第一”或者“唯一”：

第一例小儿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开胸手术；

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小儿先天性肠闭锁手术；

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儿童椎管肿瘤切除手术。这例手术，是李明君最为得意的一个成功之例。时间1997年，患儿8岁，郯城县人。病儿因为长时间腰疼、尿频等症状，到其他大医院做过数次检查，大人孩子受了许多折腾，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没查出是什么疾病、什么原因，又来本院检查。正在患者排队等候的时候，李明君从旁边路过，一眼发现了正疼得弓着腰的患儿，随即上前向孩子家长询问情况，并根据孩子的症状用手仔细检查、按压了一下孩子的腰部。已有几年临床经验、又是外科专业的李明君，手感特别敏锐与精细。他对孩子家长说：“您先不要给孩子做其他检查，先去给孩子做个腰椎CT，看下是否长了什么东西。”很快，检查报告显示孩子的腰椎有占位性病变。因为对这方面疾病没有治疗经验，李明君便

建议患者到其他医院进一步做核磁共振检查并进行治疗。没想到，患儿到其他医院做了磁共振检查，证实了李明君的诊断后，家长又把孩子领回了李明君面前，他坚持言道：只相信李大夫，还是请李大夫给做手术。手术进行得也相当顺利，孩子患得是良性神经鞘瘤，手术后不久即康复出院。

小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是小儿先天性腹股沟斜疝，发病率相当高，几乎占小儿外科疾病的一半。治疗的关键，是在复杂的相关组织中先找到疝囊再予以剥离、高位结扎后切除。而疝囊很薄弱，极为容易破裂。为此，传统手术方式在寻找、剥离疝囊时都十分小心翼翼，相当耗时耗力，目前即便在多数省级以上医院，做此手术至少也得四五十分钟，效率很低。对这种传统手术方式，李明君感到非常不满意，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点儿改进？他开动脑筋，反复琢磨，不断探索，终于发现，利用先提出精索找到疝囊的方式，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在此基础上，他又独创了“顺皮纹高位小切口微创治疗小儿腹股沟疝”这一术式。如此以来，做一例手术一般只需要使用几个小蚊钳，两块纱布，十几分钟甚至不用十分钟，就能干净利落地完成；有时仅仅一个上午，李明君至少能从容不迫地做七八例此类手术，而且复发率大大降低。据统计，此类手术目前最低的复发率为2.6%，而数年来，李明君至今做了3000多例，只有一例复发。最让李明君感到欣慰与庆幸的是，他在小儿外科工作4年，经过他手术治疗的患儿不计其数，没有发生一起死亡病例。

李明君虽然是小儿外科大夫，但是同时又承担了有些属于普通外科的同类疾病的治疗，最多的是成人斜疝手术。一次，一位70多岁的著名书法家因患斜疝，专门前来找李明君手术治疗，而且很固执地要他用传统方法做。成人斜疝不同于儿童斜疝，因伴有继发腹肌损害，除了要切除疝囊外，还要实施腹壁修补，远比儿童手术复杂。其时，成人斜疝修补术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无张力材料”，但是其价格比较昂贵，更突出的问题是因为与人体组织不能完全适应，导致复发率很高。李明君按照患者要求，用传统方法为其进行了手术，进展很顺利，术后恢复良好，患者很满意。半年后，这位老书法家不仅派人专门给李明君送来墨宝致谢，还特意介绍他的亲家找李明君再作手术。原来，书法家的亲家因同样疾病在其他医院进行了无张力材料修补后，很快复发，只得找李明君重新进行传统手术。李明君这才恍然大悟。

别人做不到的，我也要做到——只要精心

“只要用心，别人会的，我也一定能会”，这还是李明君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而“只要精心，别人做不到的，我也要做到”，则是他对自己的更高要求。《黄帝内经》曾高度评价医道是“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要真正掌握“精光”之道，则必须要靠医者的“精心”。

1999年7月，李明君担任了医院外二科副主任。不出数月，2000年他却又被调整到泌尿外科。其原因，则是有崭新任务要他来承担，则是因为他的“用心”与“精心”。为了适应医学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病人日益增多的需求，医院投资40多万元，引进了一台输尿管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机，这在全省都超前了一步，省内其他医疗单位都还没有上这种设备和技术。为了抓紧掌握这一新设备新技术，医院领导特派李明君前往广州珠江医院进行学习培训。说是培训，其实只是观摩，只能听人家说，看人家操作，连机器都不让摸一下，更不用说上机练习了。人家用完机器，立即消毒清理、严密保存，让你根本不可能近距离接触。但是，一心求知、细心精明的李明君还是暗中发现了机会：在一间存放陈旧物品的房间里，放置着一台“退役闲置”的碎石机，看管也十分松懈。于是，他便经常独自悄悄地“潜入”房间，精心地研究摆弄起来。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甚至连导管的弯度、长度、软硬、粗细、手感等，都精心、反复地抚摸、量度、体验，牢牢地记在心中。加上他的“物理天赋”，很快就像驾驭一匹驯服的小动物，了如指掌、应用自如了。

回到医院后，在准备使用这台设备为患者治疗前，他还是不放心，精心制定具体而详、细致入微的预案，甚至连万一使用设备手术不成功，如何再立即转换为传统方式继续手术的



“无缝衔接”都设计得万无一失。在此前提下，他终于开始试用此项新技术开展治疗，一连数例，都获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为此他信心大增，正式开展了新技术的应用。同时，他又对机器和操作技巧等进行了深入精细的研究。比如他发现，光源灯的亮度与角度，显示器的分辨率和饱和度等，都直接影响和关系着操作时的观察、判断与精准程度；再如输尿管肾镜的润滑剂用油质还是水质，灌注水的压力大小等，又直接关系到对器官的刺激程度与患者的感验，关系着手术的顺利与否等等，所有这些，他都研究出了一个独自的最佳标准与度值，保证了各项操作恰到好处。随着手术量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他的操作逐渐达到了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境界，特别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在使用此类设备进行手术时，几乎所有医生都需要助手，至少两人以上才能完成，而他完全可以“单枪匹马”，一人胜任。

在李明君已经熟练运用此项技术五六年后，几个省级、市级医院才刚刚起步，而且进展十分艰难。几年前，李明君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关于此项技术一次学术交流会。一位老专家说：此项技术虽然先进，但是目前看还不成熟，70%的还不成功，而且还容易导致设备的损坏。专家所带的两个研究生，还进行了现场演示，结果很遗憾，都以失败告终。但是细心的李明君立即发现，他们的操作都有些不恰当、不合理的地方。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他们虽然都已“知”已“会”，但是还不精，研究欠精深，操作欠精准，总之就是还不精到。为了给这项技术“正名”，促进交流，推动进展，吃午饭时，他主动找到了专家与他的学生，实事求是地报告了他在开展这项技术上的成果，并且诚恳地指出了演示不成功的原因所在。专家和他的学生对李明君立即刮目相看，吃惊地问：“成功率能达到90%以上？不可能吧！不过你指出的问题确实准确，你提的改进意见确实很有道理，佩服！”自此，他们不断加强学术交流，成了要好的朋友。

目前，李明君已经应用此项技术治疗患者2000多例，成功率高达90%以上。他说：“北京、上海的医院能做的，我们都能做，只要不是患者输尿管狭窄，只要能插入导管，没有做不了的。”业内同行们则戏谑地敬称李明君为“全省内一流的‘弹道专家’”。

尿路腔镜直视技术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疗还有着广泛用途，李明君充分运用这一技术，为广大患者解除了许多病患。2015年，一位女性患者找到李明君求治。她跑过很多医院甚至北京的大医院，都只是诊断为“右侧重度肾积水，输尿管全程扩张”等，但只是查出了症状，却没有给出病因，有的医院干脆建议她实行尿路全切除。经李明君仔细询问，患者告之其以前做过剖腹产手术，李明君立即敏感地考虑到：会不会是因为剖腹产手术导致的尿路狭窄或者闭锁引起的？随即建议她做个输尿管腔镜检查。但病人总是有些怀疑：北京的大医院

都检查过了，还有必要在这里再做这种检查？随即起身而去。半年后，患者因症状加剧，只得住进了中医医院，李明君再次建议她做腔镜检查。患者受不了病痛折磨，再三犹豫后，终于同意了李明君建议。结果，腔镜导管进入不到一厘米，即发现患者因剖腹产导致的输尿管膜状闭锁。李明君只用一根很细的导丝将闭锁处捅开，扩张后置入支架，问题立即解决。病人这才对李明君的技术口服心服，佩服、赞扬不已。

虽然技术日臻完善，患者需求不断增加，但是李明君并不为此而轻易对患者进行此项治疗。他说：“运用任何医术，都要牢牢坚持对病人负责的前提，严格指征，权衡利弊，综合评价。技术再先进，也必须看患者有无使用这项技术的必要；运用再熟练，也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没有必要，没有把握，绝不能轻易实施。一切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实在做不了的，也不能勉强，更不能盲目实行。”对大部分尿路结石患者，他都建议首先使用保守疗法，根据病情使用中药或者只多喝水即能排出的方法。有一次，一位年逾八旬的患者因突发剧烈腰疼，前来就诊。经过检查，发现老人肾内布满结石，但是肾功能却很正常。询问病史，老人回答说肾结石已经四五十年了，一直无疼痛感觉，但是还是坚持要求做肾镜下碎石手术。李明君精心思考和分析后，觉得老人的腰疼应当与肾结石无关，而且老人肾结石四五十年了，说明他能适应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必要做肾结石手术。最后，再经深入检查，发现老人腰疼的根本原因在于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压缩性骨折所致，于是建议老人转到骨科进行治疗。老人这才恍然大悟，连声夸赞李明君是真正为病人着想的好大夫。即便不使用腔镜技术而是运用传统技术，李明君也始终遵循并坚持让病人以最小的生物学代价获得最大治疗效果的原则。比如运用穿刺技术治疗复杂的肾结石，他总是前思后想，反复比较，精心设计，尽最大努力，做到只穿刺一个洞就能兼顾所有结石的探取。

这些年来，李明君共有4项科研成果获得临沂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医学专著3部，在国家、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篇。2012年6月，他获得临沂市“百名优秀医生”荣誉称号。他在泌尿外科及小儿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的诊断治疗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在腔镜直视下尿路结石碎石取石术，泌尿系统肿瘤及前列腺电切术；尤其是在输尿管肾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尿路结石、利用电切镜进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治疗肾盂输尿管癌等方面，在全省内具有领先水平。

自2003年起，李明君就担任了泌尿外科主任。后来随着业务扩大，泌尿外科分成一、二科，他又兼任一科主任。仅一科这几年平均都有五六百台手术。李明君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既要按时坐专家门诊，又要上台做手术；既要亲自干，又要带队伍；白天忙工作，晚上还要时常替其他同事值班，有时接连几天几夜不能回家。他更十分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总是勉励他们“长江后浪推前浪”，奋发进取，积极向上，同时把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说：“只要跟着我，就绝不能让年轻的后来人越学越倒退，只能让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积极性，越干越有奔头，越干越有希望！”

这也是李明君最衷心的期望。

临沂市委书记王玉君对全市地方史志工作作出批示。11月，市委书记王玉君对全市地方史志工作作出批示：史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主阵地，担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记录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弘扬时代精神，特别是弘扬沂蒙精神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全市史志部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以修志修佳志、编鉴编好鉴为目标，紧紧围绕市委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扎实工作，尽心尽责，取得了较好成绩。希望全市广大史志工作者，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深学透上下功夫，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精髓，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史志工作中去。要做到爱岗敬业，以从事史志工作为荣，脚踏实地，甘于寂寞，牢固树立严谨细致、积极进取的优良作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为党立言、为政存绩、为民立传、为史留鉴，全面开创地方史志工作的新局面，为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加快社会主义“大美新”临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史志办学习贯彻市委书记王玉君重要批示。12月1日，市史志办党组召开专题会议，就贯彻落实市委书记王玉君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史志各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指出，王书记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史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是对全市地方史志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和鞭策。全市史志系统要认真学习王书记批示精神，进一

步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更加团结、务实、创新的精神状态，推动各项工作再创佳绩，力争全市地方史志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美新”临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史志办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12月11日，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分别召开党组会和党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议要求全办同志要对习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进行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反弹回潮。

市史志办为“第一书记”村捐赠图书。11月30日，市史志办向选派“第一书记”村河东区郑旺镇宋庄村，捐赠了价值50000余元的1500余册图书。

市史志办到“第一书记”任职村开展结亲连心活动。12月8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带领全办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到“第一书记”任职村河东区郑旺镇宋庄村开展结亲连心入户走访活动。

市史志办发文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为沂蒙党旗添光彩”主题实践活动。12月，临沂市史志办印发《关于“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为沂蒙党旗添光彩”主题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确定从现在开始至明年6月份，在全市史志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为沂蒙党旗添光彩”主题实践活动。

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到市方志馆调研。12月14日，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到临沂市方志馆调研方志馆布展工作。刘志强现场考察了布展情况，听取

各功能区设计以及布展施工具体情况，对方志馆下一步布展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费县完成史志工作“三全”目标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12月，省史志办下发文件，在全省推广“费县经验”。近年来，费县史志办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奋起直追，2015年提前完成中指组提出的“两全”工作目标，2016年提前完成省里提出的“三全”工作目标，走在了全省前列。

兰陵县史志办到淄博市临淄区考察交流。12月13—14日，兰陵县史志办到淄博市临淄区进行了考察交流。

莒南史志办赴莒县史志办学习交流。12月26日，莒南县史志办赴莒县史志办学习交流。

沂水县史志办参加首届全国年鉴论坛。12月21—22日，首届全国年鉴论坛暨《中国方志发展报告（2017）》《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出版座谈会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沂水县史志办提交的《新时代拓展年鉴社会服务功能刍议》论文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莒南年鉴（2017）》《莒南县情概览（2017）》出版发行。12月，《莒南年鉴（2017）》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由莒南县史志办编纂的《莒南县情概览（2017）》出版。